

民主主义

民主言論集

第五集

人民的責任應該說話

馬 叙 倫

我們日日高唱着實現民主政治，而當前發見了一個阻礙民主政治實現的事實，正如特別快車，加速地前進。開車的喇叭不斷地拉，前面却放了一座幾萬噸重的大礁，這座大礁如不聳開，喇叭是白拉的，站在車旁或坐上車的人們是白白噪急的，而這座大礁自己是不會得移動的。那末想這輛車子真是特別快地前進，必定還須大家先把這座大礁聳開。

在民主世界的氣氛裡，如果我們中國不加入化合，而想逍遙在這氣氛的外面，恐怕是不可能的，因為終究會被合作用用別種方式吸收進去。所以我們無疑地必須加速來促成民主的實現。但是不幸而發生了一個阻礙，我們如何可以再取「袖手旁觀」的態度？

國家是我們的國家，不是什麼黨什麼派的國家。譬如一個大組織的家庭，對於這個家庭的生存和發展，應當怎樣的辦法，方能達到目的，這是整個家庭的問題，每一個人都有應當負的責任，也是每一個人都應當提出辦法的。不過多數的子弟們都放棄了他們的責任，或者是這些子弟們智識的不毅，拿不出什麼辦法來，那末只能讓少數的提了辦法出來。甲乙丙丁各有各的辦法，各向這些沒得辦法提出的子弟們來說明各個辦法的理由和利害關係，深問和徵求他們的同意；當然他們有憑着自己的觀察力審判力去選擇決定的自由。各個提出辦法的子弟們用盡了大吹大擂的力量，畢竟誰能到得他們的同

意，還在由他們自己切身利害上作最後的決定。一國裡面的政黨、政黨的有政綱政策、就是這樣的情形。

一國裏到有了兩個相等力量的政黨發生不調和的時候，第三黨或第三者是有力量決定他們前途的，因為他們雖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但是第三黨或第三者可以從過去、現在、未來去審量實際的適應而左右他們的。換句話說，這時候第三黨或第三者絕對的非明瞭自己的責任不可。因為這時候除了愚蠢無知的或是一般糊塗蟲以外，沒有一個不應當曉得這是我們自己的生死關頭，決不許我們再作「袖手旁觀」的。

現在我們很明瞭我們中國所處的環境，決不能不開起日行萬里的實現民主政治的特別快車。但是偏偏車子前面放着一座大礁，這座大礁不但引起了坐在車上的人煩噪急迫的情緒，就是旁觀的人也同樣地心焦，可見得這個問題的嚴重了。

這個問題就是從日本投降後報紙上不斷地記載的「國共問題」。「國共問題」自始就嚴重的，不過現在益發顯著了。這便因為環境的關係，已逼到尖銳化的程度了。但是以前，至少十年以前，「國共問題」是不能成爲一個名詞的，現在居然「國共問題」正式地在報紙上大書而特書，社會心理上也都承認他是個問題，這便是嚴重性的實證。那末我們做了這個國家的國民，還有躲閃偷避，學寒蟬噤口的餘地嗎？

這種問題如發生在美國，早已各方面有痛痛快快的言論了。現在我國的發言者，總不免有新娘子

怕羞或是風吹牆頭草兩面倒或是「和事老」的態度，總不能如柳敬亭說書，叫人聽了「痛快淋漓可歌可泣」。就是國共以外第三者的說話，也是藏頭露尾，有叫人不痛快的地方。至於第三者的老百姓，本來有許多睡在鼓裏的，就是「千醉一醒」「衆濁獨清」的人們，也是「口欲言而嚙嚙」，這是無怪其然的。因爲以前言論不得自由，說些老實話，給你戴上一頂「紅帽子」，你便受罪了。何況更有其他呢？現在不是言論出版集會等等的自由，可以不受限制了嗎？雖然在軍事區域還不會許給我們全部的自由，但是我們自己要走上實現民主的路，除了通敵附逆或是洩漏軍事秘密實際的擾亂秩序以外，我們應當奪回一切最大的自由，尤其是言論自由。我們不能顧惜個人利害，我們應當曉得歐洲人的自由，是犧牲多少生命換來的。我們懂得這個道理，我們應當說的，我們不得不說，這也是我們的責任。

別的地方，我的耳目有限，我不曉得；上海呢，本月六日大公報社論居然有「中國政治之路」一篇，裏面有兩個譬喻，總算是從問題的正面來做「破題兒第一章」。我且將他的原文節寫在下面：

「假如我是蔣主席，我是中國第一大黨中國國民黨的總裁，我是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主席，我領導國家抗戰，得到最後勝利……我決心把國家引導上民主憲政之路，我立刻宣布國民黨不再專政……還政於民，我邀請一個全國性的會議，（如同擬議中的政治協商會議）協商國事，我決定召開國民大會選舉政府，制頒憲法，我不考慮個人是否能繼續執政，我也不計算國民黨是否能得到多數……我願

意重選國民大會代表，以問經過八年大戰以後的全國民意……我寧意把五五憲草澈底修改，務使中華民國的憲法是一部嶄新的民主憲法，我主張軍隊國家化，不使留有任何黨的形式及任何黨的痕跡；我極欽佩華盛頓，華盛頓領導美國的獨立戰爭，手創北美合衆國，勝利之後絕對是國家的領袖，他召集了一個完全民選的國會，制定了一部完全屬於人民的民主憲法，（讀美國的憲法，幾乎沒有一條不是人民限制政府的……）他當選大總統連任一次之後，即宣布不再連任，創立了一個優美的民主傳統。……我都不計個人權位，不計黨的得失，一切問民意，一切遵民主。……

「假如我是毛先生，我是中國第二大黨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我曾領導我的同志參加國家的抗戰，……我對當前的國事有發言權，……我早經告訴國人，中國的革命還是國民革命，應該實行三民主義。……我為國家為人民爭民主，務使國家走上民主的大路，在民主的原則上，我一切爭，一切不讓，我要求國民黨結束訓政，但並不必由共產黨專政，我要求重選國民大會代表，……以問全國民意，……我主張澈底修改五五憲草，務使中華民國的憲法成爲一部屬於人民的民主憲法，我爭黨的地位公開，我爭各種基本的人權自由，這一切都是民主的原則，我都必爭，我都不讓，這一切得到保證，我即宣布取消邊區政府，我即宣布改組我黨的軍隊，使之一律國家化。」

看呀！這算雙方聽了都有些逆耳的話吧，這是我們「骨梗在喉」都要「一吐爲快」底吧。但是我怕讀者「得隴望蜀」，反而會嫌些不穀吧。這社論還說：「假使蔣主席毛先生都如此想，都這樣做，

當前國家的問題，豈不就豁然開朗而解決了嗎？假使一方面如此宣布，如此做，而另一方面却不肯如此宣布，如此做，那自然也就是非分明，全國的民意以至世界的同情都會站到「是」的這一方面來了。請問違背全國民以至違背世界同情者還有不失敗的嗎？」我們自然希望和作者所說的一樣，但是我們有些懷疑，是否雙方都這樣地宣布了，這樣地做了，便會沒有問題？因為事體總不會這樣地簡單。我們只可以說，為國家前途打算，雙方都應當將國家民族做立場，這是一個鐵的原則。我們看穿了現實的情勢，這裡就有了缺陷，文字語言的宣傳任他們怎樣地渲染，真似「天花亂墜」老百姓們眼也看酸了，耳也聽起繭了，不但不感興趣，還憎嫌多費筆墨紙張，還憎嫌如蛙叫的聒耳。那末就是宣布了湯誓泰誓似的文章，做成極其表面圓滿的事體，是不是竟不會發生暗礁，而弄到惡劣的表面化，這是我們照經過的事實看來不能沒有這樣的懷疑的。所以我們覺得要末不談這個問題；談上這個問題，似乎大家要起來就事實上檢討，表示出老百姓立場觀察的眞意。

我們應該曉得，國民黨是由革命黨而打倒軍閥政治，而握着統治權的。他是付却代價得着民衆擁護而成功的。他現在還站在七分政黨三分革命黨的地位。當孫中山先生倡導革命時，清朝當他做叛徒，海捕文書裡把他的大名上還加個三點水；就是袁世凱時候，文書上也稱革命黨——國民黨做「革匪」，就是社會上也覺得國民黨不是好東西，到了袁世凱敗亡以後繼承他遺產的北洋軍閥還是一樣地看待國民黨。但是國民黨已經漸漸得了西南半壁的地盤，擁着革命的軍隊，社會心理上也漸漸承認他

是一個革命的集團，而不是所謂「革匪」；再到了「五四運動」以後，北洋軍閥本是並無主義的封建殘餘，加上他們自己造成的種種罪孽，最大的就是官僚剝削民衆，「厚自封殖」，由此國民黨不但不所謂「革匪」，而成了民衆仰望的救星。尤其是全國的青年「如水赴壑」地直奔國民黨，所以北伐不到一年，就打倒了軍閥政治（官僚政治），不過一年半就統一了全國。這種歷史除了現在中學校學生外，恐怕都是目覩而不會就健忘的。

與其囿圖地說國民黨得着民衆擁護而成功，無寧乾脆地說國民黨的成功是得着青年的擁護。「五四運動」是青年覺悟的象徵。青年覺悟的是什麼呢？國家和民族的危險，不是封建殘餘官僚政治可以救得；而國民黨的三民主義，是適合於挽救國家和民族的危亡的。青年有了這個認識，所以一傳二，二傳三，你拉我扯，都集合到青天白日的旗下，而青年領導了民衆，民衆也擁護了國民黨。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五四運動」的青年，參加北伐的青年，如今還很多的存在着，必定也不會就健忘的。

中國共產黨呢，也是個革命黨，起初也和國民黨一樣，是個秘密革命的集團，也是未曾得到民衆擁護的。地盤呢，更說不上了。「五四運動」是相當受着共產黨的影響的；到了「五四運動」（廣義的）勢力擴大以後，共產黨的血液便滲了進去，加強了革命的力量。孫中山先生以爲三民主義裡的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又爲要加速革命的成功，容納共產黨黨員加入國民黨，國民黨的勢力一時漲起來，果然煊赫的國民革命軍所到如摧枯拉朽，三路北上，竟克定了江南，而共產黨的根本也就埋着

了。但是在這時的前頭，國民黨裡一部分青年，看見共產黨黨員在國民黨裡有「喧賓奪主」「養子亂宗」的危險，表示不願意混在一起，便產生國民黨的右派——西山派。到這時國民黨的中央首腦部也感覺到這種危險，不能再忍，因而有十六年四月的清黨運動。從此共產黨自立門戶了。因為那時共產黨大都屬於托洛斯基派，主張的是世界革命，用的手段是暴動，受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壓迫慣了的次殖民地底民衆感覺不到什麼主義和自己切身的利害有關，而爲苟安所麻醉的心理，或者因爲尙未到水深火熱的程度）又使他們厭惡着過激的動作，所以看他們真如「洪水猛獸」，就都投靠到國民黨懷抱裡來。國民黨也真得民衆的擁護了。因此共產黨也和國民黨在二次革命的時候被稱爲「革匪」一樣，得了一個「共匪」的頭銜。他們拚命得到的地盤——江西，不久又失了，爬山過水的往西北去，十幾年來掙扎出一個延安的場面，他們在西北民衆裡埋的根也愈深了，他們已得到了民衆，尤其得到了青年。并且從前文化界的份子也看得共產黨如「洪水猛獸」的，近十幾年來也覺得共產黨至少是個「謎」——直得研究的。所以去參觀的也有了，去參加的也有了。並且從前六十歲以上的人們，提起共產黨就會搖頭，如今他們也會說共產也好，或者說共產黨也有好的地方。這都不是我替他們宣傳，或是我高興撒些謊，而是事實。由此他們被戴的「共匪」「頭銜」也自然地漸漸撤銷了。

抗戰以來，國民黨在事實上已承認共產黨爲對等的黨。共產黨有正式代表出席到參政會議，及這次毛澤東先生應蔣主席的邀請，到重慶商議國事，更加增了歷史上的一頁。那末事實告訴我們，國民

黨和共產黨已經都成了爲吾國國家和民族前途的兩個導師。雖然現在還有幾個年齡較幼稚的青年黨等，但是還沒有得着民衆的認識，我雖不輕視他們，我却不能否認他們做導師的資格還得修養些時。

毛澤東先生和蔣主席商議國事，化了四十幾日，只得了一個共同主張國家民主化的原則，政治解決，和平解決，都會跟着別種問題而抵消的。這次商議，終於因爲地盤和軍隊兩個問題而擱淺。這是我們不妨赤裸裸說的。從國民黨握了整個政權和對外的面子來說，共產黨自然屈壁，但是以超黨的國家來說，就民族和民衆的利益來說，那就不是這回事了。

國民黨是代表全民的國民革命黨，共產黨是代表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黨，代表的性質雖然不同而爲革命黨是一樣的。革命黨照例不採取溫和手段的。那末兩個革命黨裏除非一個的「火候」還沒到家自然不能相抗，如都有了同等力量，客氣點分庭抗禮，不客氣點「拼個你死我活」。共產黨如今已與國民黨「分庭抗禮」，那末希望他們在某種條件底下犧牲些，或者可以的；如果像上面所說因國民黨掌握了整個政權和對外的面子就要他們犧牲尤其重要的如地盤軍隊等，恐怕有些「鑿柄」不容吧。我只將國民黨的歷史來證明：討袁以後，軍閥何曾沒有那「堂堂正正」「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一套向國民黨說話，國民黨何曾肯交出槍桿讓出地盤？這爲什麼？簡單的說，就因爲國民黨是革命黨。現在共產黨的情勢不是和討袁以後的國民黨一樣嗎？那末共產黨今日怎樣肯憑「一夕話」便把地盤和軍隊交出來？我想國民黨「設身處地」回顧自己的歷史決不會「河漢斯言」吧？

事既這樣了，那末只有「火併」的一個辦法嗎？這個問題自然重大了。現在是否已經進入這個階段，憑着報上的披露不難曉得真相的。可是國內和國外都耽心着這一件事。六日大公報社論的作者所以發表如上面所引的這兩段說話，也是着急了吧。但是空着急無用的。大公報作者說的不過是高尙的理想，幾方不會自然地實現的。便是他們拋開了他們的主義不談，就歷史上東風要壓倒西風西風要壓倒東風，「爾虞我詐」，絕對沒有互信誠意的情形看，那能這樣乾脆地照辦？那末必須有第三者替他們來做保證。這個第三者，是不是現在的第三黨，如青年黨，國家社會主義黨等呢？是的。資格够得上嗎？那末是外國嗎？現在國際的環境裏，實在也沒有合格的。而且我們老百姓願意他們來做保證嗎？那末最妥當的還是我們老百姓自己。

我們不把他們不可以火併的理論和情勢給他們說個明白，我們不把我們的力量給他們看個明白，要做保證也怕沒有資格吧。

就理論來說，如各方所呼籲的整個國家不可分裂，和平解決反對內戰的一套，說得來雖起勁，只是供給一方利用你們來壓倒一方，若從不須利用你們的一方看來直是廢話。況且從過去的事實來說，曾經有聽了你們的話沒有？所以這些話，沒有開口，便先害臊了。因為說的人只有槓桿，沒有槍桿，不會有人理採的。但是沒有槍桿就一定沒有力量嗎？不。我們老百姓真明白了自己的地位，真真認識了他們的主義和我們自己切身的利害怎樣，我們自然都站在一條綫上，就可以向他們說：國家不是

你們私有的，你們都說得爲的是我們老百姓，你們應得聽我們來選擇和決定你們的主義和政策對於我們合式或不合式。你們應聽從我們來命令你們誰來替我們辦理這些事，用不着你們的任何一方面，替我們來否認一方面打倒一方面。但是如今我們老百姓的力量還沒有造成。

法西斯主義必定會被民主主義打倒的，不但是事實這樣了，還是他自身已孕育了必被打倒的因素。所以世界的思想前進者、認識明瞭者、沒有不打開窗子說亮話的，不似從前的澀澀扭扭了。那一切趕不上前去的任何主義，也必定會被打倒，因爲他們自身也孕育了必被打倒的因素，這是歷史法則和社會進化的原理所決定了的。孟子說：「孔子望之時者他。」這個「時」字怎樣解釋呢？孔子自己說：「五十而知天命」，這信天命是什麼呢？皇侃論語義疏裏引了許多六朝人的說法，我把他們的說法歸納起來：這是自然的環境。但孔子五十歲所知的自然的環境，不是現在一般所說的自然的環境，如「山明水秀」「麗日和風」的一類，而是社會歷史人類文化的現象。所以他要「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這是他要去適應時空的需要。我們懂得這個道理，那就不必自身孕育了，必被打倒的因素而還要拚命的掙扎上去了。

但這自然是就世界大勢來說。唯物論者亦以爲資本主義不到矛盾尖銳化，社會主義不會露面的。照這樣說，才踏進資本主義門檻的我們中國放心吧。過五十年還不會尖銳化呢。那末國民黨放着膽不必怕共產黨來搶「寶座」，共產黨也得「雌伏一時」。可是又有例外的「突躍」，突躍是環境造成

的。共產黨本來很少擴張的機會，就是過去二十年以前的環境並不許可他。但是國民黨偏替他改造了環境。這話怎樣說呢？因為國民黨有了很好的「法寶」——三民主義放着不用，却歡喜去講「野狐禪」。國民黨掌握着政權已將二十年，實現了從他們的主義而出發的政策是那一件？（自然不指零零碎碎說。）爲全民而革命，全國民衆有什麼人得到了革命的利益？（營私舞弊剝削民衆造成幾個「富家翁」除外。）所以民衆擁護國民黨的心理一日淡似一日了。上面說過，國民黨是得着青年的擁護而成功的。現在的青年至少一半向左走了。國民黨所得的青年，是否能負起如從前那樣領導民衆的責任？如今我是局外人了，自然不敢來「武斷」，這是要國民黨消除意氣「一日三省」的。國民黨在政治方面，既然沒有滲透到民衆裏面的力量，而歷年來增加到民衆身上的痛苦，到好像「有口皆碑」；尤其這一次接收投降的時候，各地的情形怎樣，不必我們再來饒舌，蔣委員長的西宥機電已充分證明了。蔣委員長將要把這些「不知自愛」的「視爲我革命軍之敵人」。那末蔣委員長內心的苦痛，定達到極點了。但是蔣委員長還不曉得一般的情形吧。如果蔣委員長「明四目達四聰」，我想他會立刻跳下政治舞臺，「披髮入山」吧？或是以主席的地位，痛痛快快地下道「罪己」的命令，立刻改造一切一切，不再和共產黨作「殊死戰」吧？

就情勢來說國民黨好像要衰老了。（其實不是，只是自己放着法寶——三民主義不用，而行官僚政治。）共產黨還是沒有大顯身手的「壯丁」，苦果雙方火併，若國民黨不靠着別種力量的幫助，我

們實在替他耽心。因為兩個有主義的黨合併，他們最基本的條件是爭奪民衆。共產黨提出民族利益勞動階級利益的口號，其他不顧一切。國民黨呢，上面說過，他還站在七十分政黨三分革命黨的地位。他如果還用革命手段來幹，他的對象便不是共產黨了。況且國民黨在大多數農民方面，絕對沒有根基，就在工人方面，也不過「臨渴而掘井」，像用糖果騙小孩子，只是一時甜甜嘴，有什麼用處。若果不向這裏做工作，而向地方去努力，就放棄了大多數的民衆，就是自己樹立了大大的敵陣。若是全面的做，可惜過去二十年的時間浪費了，除了胡裏胡塗地佔踞着政府地位，胡亂地使用着政權。沒有基礎便想建築，只怕不合理吧？何況問題還不止這些呢。豈不爲難極了嗎？

那末唯一的只有武力解決吧？我們從歷史上看，有意義的戰爭，總不是只憑着有武力而蠻幹。況且在全世界高喊和平的口號下面，吾們中國却起了內戰，是不是也得顧忌一點？共產黨呢，到滿不在乎。國民黨已是做了對內對外的全國統治者，自然不能堂堂皇皇地輕舉妄動。所以這一响聽着的，總是雙方爭着不是我先開火。（其實是無聊的，假如這次日本勝利了，世界上那個去責備他？但是明白白是日本先開火的。）就說不管這些表面文章，我們在第三者地位的來說，現在延安的共產黨總不能和瑞全的共產黨一樣看吧。再退一步，不去估計他的各方面，只要自己武力勝過共產黨，就拚上一拚，就是自己的武力不彀，也不妨利用別人的武力。我們估計共產黨的武力當然不彀和國民黨拚的，但是有主義的革命黨如果武力可以打倒，那國民黨早已沒有今日了，何況立在世界潮流頂上的共產主義

革命黨，尤其是已有歷史已有民衆的中國共產黨。我們縱然相信武力的勝利會歸國民黨的，但是共產黨的軍隊都被消滅了，他們的地盤也被奪回了，是否就算消滅了中國共產黨，恐怕任何人也不能下句斷語。況且現在的情形，已經替他們培植了許多萌芽，再經過一次戰爭，或者替他們更多播些種子，國民黨得到什麼利益？如果再是正式開戰來個「討伐令」，恐怕大家看了也和袁世凱對國民黨二次革命的「討伐令」一樣。民衆意識已顯然地和以前不同了，國民黨也得注意些吧。

日本投降，軍隊還有很多沒有繳械的。華中往北，他們夾在中間，一有戰事，是他們的幸運到了。他們雙方加入了。明曉得他們自己也會變炮灰，橫豎你們死的必比我們多，我們殺你們不盡，你們自己殺自己，豈不痛快。還有一層，國民黨使用日軍，除非目的是借此送了他們的性命，免得受「殺降」的惡名。如不是這個目的，日軍加入軍隊裡必沒有給你們盡忠的。而且他們觀察力相當的強，「順風使帆」的一套，也不必人教的。我們聽到日本人早早加入在共產黨軍隊裡的已不少，如果想利用他們對付共產黨，也得注意些吧。

國際的情勢吧，無疑地沒有自己的目的，誰來管你們的閒事？在新國際的大憲章上雖然「大書而特書」有一套保障和平的話，骨子裡仍就把自己的利害做前提。現在國際的情勢，顯然是蘇美的摩擦，在這次世界大戰裡，他們都只好打掉牙齒望肚裡嚥。但是他們在最近的期間裡，必定從別方面找出路，任何一方不會得馬上來個與你兵戎相見的，爲的是元氣都大損了。他們曉得美國的罷工是無日

沒有的，華盛頓街上男人只占了百分之一，在吾國的美國軍人都想聖誕節回去快樂一下。蘇聯呢，他們國內的情形不容易透露出來的，但是大傷元氣是一樣的。他們如今正是利用中國做「甌脫」，他們今日抱你在懷裡是有他們的需要，明朝怎樣對你，沒有把握的。照現在情勢看來，似乎共產黨靠近在蘇聯方面，國民黨靠近在美國方面。一般人對於蘇聯不甚了解，自然對共產黨也懷疑着。但是國民黨的靠近美國，老百姓也不是「坦然無疑」的。照這樣的形態延長下去，或者會由國共問題而變為蘇美更甚的摩擦，於我國的前途利害怎樣，國民黨也得注意些吧。

抗戰雖則勝利了，有人說這次戰爭中受禍害的責任是國民黨應當負的。我以為至多國民黨不得把這次的勝利據為己功，至於把禍害的責任課到國民黨身上，是不公平的。因為國民黨沒有把握政權以前，中國已經坐定有被日本侵略吞併的大大可能性。但是畢竟損失太利害了。四強裡的英美蘇都可在最近的將來透得過氣來，我們中國恐怕有很久的空息吧。國民黨把握着政權，當然不能避免責任。現在正是「萬目睽睽」看事實的時候。大學裡說：「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國民黨要保持政權，不可忽視了這兩句古話，否則就有自己踢臺的危險。或者這種危險便在面前。因為又有一句「民不聊生」的古語，是歷史上執政者失脫政權的主要因素。國民黨也得注意些吧。

上面說了這些話，好像都是片面責備國民黨，這倒我也承認的。因為我未到「弱冠之年」已有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思想，過了二十，便加入同盟會外圍的南社，也曾做過國民黨北京特別黨部的宣傳部

長，也會踏過血蹟而嘗過小小流血的味道，也會在國民黨治下努力過政治工作，雖然從十九年起不讓我再占國民黨籍了，但我不會再加入任何黨籍。（我到今日為止，不會有過別黨的黨籍，以前語絲雜誌裡說我本是進步黨，不曉得他們是不是調查過進步黨的黨籍，否則，我的師友倒有許多是進步黨黨人，他們可沒有承認過我是他們的同志。）我的歷史上和國民黨這樣的關係，所以不免有「三宿桑下」的意思。因此也不覺得便有「責備賢者」的意思了。

現在結束我的意思。我在中華民國國民的立場，至少我也可以代表完全與我同意的若干國民來說，我們毫不籌著的承認國共兩黨是有對等地位的，沒有正僭順逆的偏見。我們也直截痛快地告訴你們，不論你們握着統治權和沒有握着統治權的你們都不能拿你們的黨來代表我們全體民衆所有的國家。你們都說是爲着我們老百姓的利益，那末你們誰給過我們利益，我們自有判斷力的。我們在抗戰前，尤其是在抗戰八年裡，吃盡了千辛萬苦，我們的犧牲，正是算不清這盤賬，我們爲什麼這樣的忍受，決不是爲的你們兩黨的利益。我們果然希望你們幫助我們得到利益。我們決不能爲你們兩黨勢力的消長再來做你們的犧牲品。你們如果要品道理，你們應該各把道理拿出來，我們從超黨的立場來給你們評判。你們不用民主的政治方式來解決你們的問題而「訴訟武力」，我們認爲是你們的私鬥，我們認爲都是背叛我們老百姓意思的行爲。你們如果竟不停止私鬥，使我們再受到任何犧牲，我們是會檢討了事實和你們算賬的。

我希望你們趁早收帆。我現在是個自由主義者，也是一個迷信「莊」「老」的自然主義者，我不喜歡說遮遮掩掩的話，我不喜歡做強強勉勉的事，我以為片面的拿什麼整個國家啦，對於面子啦，這些來做前題，解決「國共問題」，必定愈弄愈糟，愈糟愈僵，古人說：「絡馬首穿牛鼻」那末反過來穿馬鼻、絡牛首，馬怕是違背自然吧。所以我以為雙方不要再來東風壓倒西風、西風壓倒東風的一套。你們的黨是建築在你們的主義上的。你們拿主義來求得民衆的擁護，你們的主義是為老百姓求利益的，你們不要忘記了老百姓，你們應得服從老百姓的意思。老百姓願意擁護那一黨，便應該互相承認了地位承認了現實，既然了解了自身和環境的情勢，在這個原則底下來解決「國共問題」。

柳亞子先生說得好：「現在所謂『國是』問題，絕對不是國共雙方的問題」。我們有了這個認識，我們便有了把握，我們就得依着這條路線去解決「國是」問題。而「國共問題」只是「國是」問題裡的一個問題，不過「國共問題」要「國是」問題裡一座大礁。怎樣搬開這個大礁，在國共會議中已經商定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各方面也多贊成這個方式能夠就從這裡順利地解決，我們也可以不再發表意見。不過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資格如果止屬於國共兩黨在內的各黨各派領袖，果然仍是分莊式的黨代表，而不是民衆的代表，其力量是不是殼來解決這個問題？是不是能澈底解決這個問題？恐怕也許得竟不能解決，或只解決得一半。那末又怎樣呢？本月十五日上海大公報社評「應該問問人民！」裡面有兩句話說：「今天所爭議的地盤問題實質就是若干省區的用人問題」，我覺得這是打開窗子說亮

話。就現實來解決，也不背了政治上的原則。如我這個自由主義者就是這個主張。大公報社評又說：「這從人民立場看，爲省政用人，就是選擇一批公僕，而雇用公僕，無論如何，應當是主人的事，不應由僕人爭吵，這一點應當由主人作主，應該問問主人。在國民大會未經舉行中央政府未經民選以前，目前有會議的地方，可用民選公僕的方法解決，國民黨可以推舉一批候選僕人，共產黨也可以推選一批候選僕人，其他各黨各派無黨無派的人也可以經過參政會或政治協商會議或其他方式，推舉一批候選僕人。你們把名單開出來，把政綱政策說出來，讓主人來決定選用何人。山東省的候選人就讓山東省的人民來票選，山西省的僕人就由山西省人民來票選，你說現在各地情形特殊，人民不能自由表示意志嗎？不要緊，選舉那一天，可以讓國民黨共產黨各黨各派無黨無派的人家連環監視，：你說人民知識不彀，沒有準備嗎？歐洲許多小國如何民選過來？」社評裏又說：「用人如此解決，軍隊也可以如此解決。」我很贊成這個原則。

但是我覺得現在「國共問題」完全是西風要壓倒東風，東風要壓倒西風。不過如果雙方都沒有背景，就事實來說雙方都不可能如果他們偏要造成可能，那就得犧牲老百姓。他們不替我們打算，我們那能不替自己打算？當然再不能遲疑。等到全國火砲聲中來說話，已經不曉得要喪失多少同胞的生命了。我以爲不妨把他們雙方的主義和政綱政策來叫全體民衆作總表決。姑且用少數服從多數之例，決定了他們的前途，也改變了他們的性質——革命黨變爲政黨。他們的誰勝誰敗，靠着他們自己

主義的發揮力，不靠着火炮的發揮力。那末我們自己也解脫了爲他們的私鬪而犧牲的危險。

如果這個方法大家以爲不妥，那末非得採用大公報社評的主張了。我以爲這兩種辦法，都比較直截痛快，而較無弊端。不過要他們馬上放下槍桿，而從我們的主張，聽候民衆的解決，必須先撤銷他們背後的槍桿。假定共產黨背後有蘇聯的槍桿，我們是反對的，我們現在憑報紙上的資料，不能證明有沒有這種事實，但是我們也沒有看到反證。國民黨方面有沒有請求美國的幫助，我們也不能判斷。但是以戰勝國四強之一的國內受降事件，竟需美軍來「代庖」已穀「倒楣」，而美軍毅然地接受這種請求，雖爲盟國友誼的關係，却引起了吾國民衆異常的感覺。至如特魯門總統下令「繼續以租借法案之援助給予中國，俾其得在全國包括東北諸省在內完成日軍投降之工作，」那末完全看得中國與日本尚在交戰狀態中。但是日軍固已完全投降而在靜候接受中。就是日軍或者還有死恢復燃之可能，止須中國軍隊自己再作一度的支配，決無問題的。

話說說回來了，他們雙方正在趨向火併的前途，蘇美如果顧全世界大局，沒有利用中國的惡意，客觀的中立的看準了中國老百姓的意思，正好和中國老百姓合作，出來周旋，使他們不得再趨向火併的前途。保全了中國的和平，也就撐住了世界的和平。

怎樣推進民主運動

利

甫

今天要推進民主運動，假如不去爭取廣大的羣衆來參加，那只是一句空話。這就是說，今天誰要獻身於民主運動，誰就應該到廣大的羣衆中去。羣衆工作是今天爭取民主工作的重要的一個環節，要鞏固和擴大它，才能產生出巨大的力量來。

然而，怎樣去組織羣衆團結羣衆，怎樣用民主的思想去影響羣衆爭取他們參加到推進民主運動中來。這個工作是艱鉅的，絕不是登高一呼或是單憑着熱情可以成功。固然羣衆工作者要有高度的熱誠和耐性，但在進行這個工作的時候，還要加上適合於各個不同情況和條件的具體工作方法，這方法不是從主觀上的抽象概念得來的，而是從現實工作中總結經驗和教訓創造出來的。在這裏，我們着重地提出，你要做羣衆工作，你就得先向羣衆學習，了解羣衆，做羣衆的忠實學生，只有在不斷向羣衆學習中創造出來的工作方法才能够幫助你獲得工作效果，幫助你開展工作，否則你會是高高在上，主觀上的一切願望都會是牛頭不對馬嘴，到處碰壁。

向羣衆學習可不是盲目地跟着羣衆走，首先自己要有一個堅定的立場，今天爲了團結進步努力爭取民主政治的實現便是我們工作的立場，要站在這個立場上才不會迷失了方向。那末，我們向羣衆學習些什麼呢？我們要虛心學習羣衆的長處，尊重羣衆的要求，記取羣衆的寶貴意見，從羣衆的極見中

可以反映出我們的作風是否正確。羣衆是我們的最好的一面鏡子，這就是說，向羣衆學習可以改造自己，可以進步自己，可以團結羣衆，最後可以把工作推進。智識份子的嚴重毛病便是自己有一種「唯我獨尊」的驕傲感，由於這一種驕傲感，也就不容易和羣衆接近了，更談不到向羣衆學習，老實說，誰要不把這一毛病克服過來，誰就不能把工作做得好。

向羣衆學習是做羣衆工作的一個基本態度，但在工作的開始當中，我們認爲有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要熟習羣衆的一切，要深入地瞭解羣衆。假如我們對羣衆瞭解得不够，那末聯系他們，組織他們和影響他們都會感覺到困難。瞭解羣衆要深刻而且正確，羣衆的一切問題要加以仔細的，客觀的和全面的觀察和分析，可不要太主觀或是一時憑着感情和意氣，強調了一面而抹煞了另一面，抓住了缺點而忽視了優點，或是誇張了優點而掩飾了缺點，甚至在優點和缺點中間分不出輕重來，這些都是不够瞭解羣衆的錯誤看法。瞭解羣衆，首先當從羣衆的出身、個性、私生活、人生觀、文化和政治水準一直到職業環境和社會關係的各個方面去深入調查和研究，這才能够幫助我們瞭解和確定羣衆是屬於那一種類型，屬於那一個階層，是進步的還是落後的，是中間的還是帶點反動的，從這樣的瞭解去估量可能發展的傾向，以決定我們去聯系，組織和影響他們的具體方式，這才能够做到對症下藥的第一步。

第二、要經常密切聯系跟羣衆作生活上的或工作上的密切聯系，從羣衆的行動表現。無論是對人

或是對事，從群眾的言論觀點，無論是對國家大事或是對私生活的瑣屑問題，都是現實地幫助我們深入瞭解群眾的思想意識。這就說明了群眾工作者和群眾的不能脫離，也就是做群眾工作的起碼要求啊。假如我們能够以集體學習的方式把群眾組織起來，每兩個星期或一個星期大家來開一次會，而在距離見面的時間內，是不是就沒有必須再見面討論問題呢？否，集會時聯系，散會時便各走各的路，這種聯系方法不僅是不夠，而且或多或少犯了形式主義的錯誤。我們認為除了領導集體學習和工作外，更應當加強個別聯系和領導，要經常有固定的時間去找朋友作有計劃的談話，不好是高興時去找朋友一次，不高興時隔了許多時候也不去找，這種自由主義的隨便作風是不行的。我們要強調集體領導和個別聯系是統一在群眾工作裏，而是不可以分開。

第三、要把握得緊。聯系了一群朋友而不能夠把握得緊，即使一切工作不是完全白做，至少會影響到工作的開展，而把工作始終停留在某一個階段，甚至隨時都會有瓦解的可能。這就首先須要認真的積極的領導了。僅僅口頭上或形式上的領導，而在實際工作中並沒有起領導作用。那是等於零的官僚主義的作風。其次，便是在群眾中提高自己的聲望，使群眾信仰你，尊重你的意見，但，提高自己的聲望，使群眾信仰你，尊重你的意見，絕不是盲目地抬高自己，開口閉口都是教訓人的一篇大道理可以做得到的。儘管你說得多漂亮，假如你在實際工作中不和群眾打成一片，在工作中沒有做到「一切為群眾和盡力為群眾」的話，那聲望是無從提高的，要群眾信仰你就更不可能了。所以，我們認為

要從積極領導群眾來把握群眾，首先要把握群眾的一切問題作爲自己的切身問題來看待。關心群眾的一切問題，幫助群眾做學習或工作計劃，不怕麻煩和負辱地幫助群眾解決學習上和工作上的一些困難，同時在群眾中處處表現我們的模範作用，表現我們的高度的積極性和認真負責的熱誠。良好的感情基礎和群眾對你的信仰便是建築在這樣的作風上面。不過，所謂感情基礎，只能是你聯系群眾，而不能用來把握住群眾，我們不能贊同純感情主義的作風，主要的還是要使群眾的思想意識和我們一致，不論是學習或工作都能跟我們走上同一個正確的方向，只有和群眾的思想與行動團結一致，才能夠切實把握得緊。

不能否認的，我們要想把進步的民主思想作爲群眾的思想，進而影響群眾參加到爭取民主的實際工作來，我們就會發現有許多困難，這困難首先表現在說服工作。的確，說服一個人，頗非易事，比如，你要緊張嚴肅，他却要散漫自由，你要他不斷進步，他却要保持一個限度，甚至對一個問題，他執拗偏見，犯了一些錯誤，一時無法矯正。這些都是不易馬上說服的問題，而是需要較長的時間或耐心的說服，但所謂較長的時間和耐性的說服，也並不是無限制地拖延，把工作困難作爲主觀上去努力的藉口，這是對工作敷衍。在這裏，說服工作和領導工作是相互關聯的，要得到說服的成果，就當有積極的領導：要達到領導的目的，就當有不斷的說服，這是相互推進的。進行說服工作的一種方法是從積極領導中常常檢查和總結工作，從檢查和總結工作中展開批判和說服，這是集體批判說服的

一種做法，也是對事不對人的一個原則。但這樣有時還不够，最好還要配合個別的說服教育，這也就是說，個別聯系談話的機會必須頻繁了。

說服群眾思想意識的錯誤的時候，我們有時會覺得千頭萬緒，好像是無從着手，這是什麼道理呢？這是我們沒有把群眾的意識錯誤加以研究和總結，抓不住錯誤的主要根源，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時反而把嚴重的錯誤忽略了過去。這時值得注意的一點。另一方面，我們曾經提出說服工作需要耐性，這就是說，性子不要太急，對群眾思想要求不必太高，更不要做超現實可能性的奢望，一切問題提出，最好不要太理論化，說服應當從客觀存在的現實問題做出發點，從分析這些現實問題找出正確的理論和方針，而在進行說服的過程中，首先必須尊重這個朋友，盡可能要維護他的自尊心，說的時候態度固然須要誠摯，但可能被誤會為諷刺性的言詞或是滔滔不絕儘管說人的短處都是些不甚妥當的說服方法；因為這些必然會造成三言兩語就各走極端的僵持局面，即使被說服的人一聲不響，但說的人也未必成功，這就無形中已妨礙說服教育的進行了。所謂「說服」也者，就是你說的話要使聽的人佩服，進而自動地遵從你的意見。為着要達到這個目的，你就不能不顧慮到被說服者的一切可能反應了。好好先生主義固然要不得，但一展開說服教育就和群眾合不來，那就什麼也不能幹了。思想的錯誤固然須要鬥爭，但在非必要的時候不分輕重的亂鬥爭，亦非適宜。因此，為着要說服群眾影響群眾走到我們這一邊來，有計劃的說服教育是一段必要的工作過程。而在進行說服教育時，除

了針對群衆的弱點和缺點外，同時更要鞏固和發揚群衆的優點和長處，鼓勵群衆上進的熱情，在民主運動中站定了一個崗位，方能從實踐中檢查行動和思想意識的正確和錯誤。一句話，不從實際行動去克服錯誤，一切說服都是空的。

我們已經說過，說服教育是做群衆工作的一個必要工作過程。最後，我們還要提出一個問題，就是怎樣把握群衆的情緒，群衆的情緒可能決定工作的效率，我們不能不注意。經驗告訴我們，群衆的情緒常常不能像我們所希望的那樣高漲，一方面固然是因爲他們從那些落伍腐敗的地方帶來了一些不良意識，他們都會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而另一方面呢，也是因爲好幾年來沉悶的政治氣氛窒息了不少的善良青年。今天，要是硬把我們所願望的學習和工作的生活方式套在他們頭上，他們一定會感覺到頭痛，甚至於對你會敬而遠之了。比如較爲落後的群衆吧，他們是純潔的，而且也有學習的要求，可是他們的學習內容和我們兩樣。要聯系他們和教育他們，你大可不必一下子就把他們的需要推翻，你可以從尊重他們的需要展開對他們的教育工作，造成生活上的密切聯系，經常可有談話或討論問題的機遇。那末從今天日常生活中所接觸到的許多現實問題都能談到努力爭取民主政治實現的必要來，這就打開了以民主思想影響群衆的大門。所以我們認爲用各種方式的組合——不管是較爲活潑的或是嚴肅的——來聯系和團結群衆，傾聽群衆的意見，尊重群衆的要求，是可能提高群衆的學習和工作情緒的。

落後群眾的情緒是逐漸培養起來的，不是一下子可以成功。起初，可以幫助他們創造一個學習環境，根劇他們個別的具體環境和條件幫助他們作學習計劃，造成濃厚的學習空氣。有機會多多介紹他們去參加有關民主運動的集會，介紹立論正確的書報雜誌給他們，常常和他們談我們自己的學習和工作經驗，影響他們，灌輸他們以進步的學習內容，啓發他們對今天民主運動方向的認識和對民主運動的熱情，鼓動他們向爭取民主的道路前進。

群眾工作是艱苦而繁瑣的，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我們除了懂得原則上的一些方法以外，我們還要加強自我學習。當工作向前發展的時候，就需要我們有更強的能力來擔負起來。爲着培養自己的能力把工作推向前去，我們應當時常根劇工作中的一些現時間題多調查、多思想、多研究和多創造，一切學習都爲着工作開展，這便是從工作中學習，從學習中展開工作的理論和實踐底聯系，而在工作進行當中，我們要有韌性的戰鬥精神，要沉着，要有高度的自信。自信並不是驕傲，而是支持你對工作的勇氣。假如你實在覺得空虛或是能力不夠，而動搖了自己擔負工作的自信心，那唯一彌補這個空虛的方法，便是從工作中多調查、多思想、多研究和多創造。

在進行大後方民主運動的工作中，廣泛地展開群眾工作是不可被忽視的。我們認爲：今天多培養一個對爭取民主政治有熱情而能獻身於民主運動的青年，便是對民主運動多增加一份力量，儘管這力量是一點一滴，但總會有一天把這一點一滴的力量匯集成一道民主的洪流。

澈底的民主與形式的民主

嚴 景 曜

「要建立燦爛光輝的新中國，首先必須爭取實現民主政治。」這是勝利以來全國上下對於建國的
一致要求，這也就是人民大眾逼切的呼聲。因為中華民國成立已有三十四年，而民主政治却從未實現
過。其間雖然人民時有民主的要求，但中國政治不是爲軍閥所摧殘，就是被官僚所壟斷，再加上帝國
主義的侵略，使中國人民無時不在水深火熱的重重壓迫之下，微弱的民主呼聲，就從來沒有發揚光大
的機會。

但是勝利以後，中國在國內與國外的各種關係上，已起了根本的變化。帝國主義的壓迫與侵略從
此一掃而光，中國已一躍而爲世界少數列強之一，國內的軍閥已在抗戰的過程中漸次剷除，人民的國
家意識，經過這許多年抗戰的洗煉，已日益加強，執政當局已一再聲明要「還政于民」。如蔣主席在
抗戰開始的時候，即聲明「民主政治爲抗戰建國之前提」以「建立永久的真正的民主政治基礎」相勉
勵。當一九四四年間中國抗戰方殷，正在與頑敵作殊死戰的時候，美國副總統華萊士來華訪問，蔣主
席於六月二十四日與之共同發表宣言，其中也說「太平洋勝利的目標，在乎建立一個民主和平，基於
政治與經濟的安定，此種安定，必由爲人民謀利益的政府所產生。」勝利以後，蔣主席在慶祝勝利廣
播中，又大聲疾呼的說：「我們今後的努力，則在國家統一，政治民主。我們只有共循統一與民主的

道路，完成建國工作，實行國父的三民主義，纔能同臻於國力充沛，民生康樂的境域。」同時我們的盟邦美國，也一再聲明協助中國建立民主政治，十月二十日美國國務院遠東司司長范宣德在紐約發表了一篇闡明美國遠東政策的演說，他明確宣佈美國的遠東政策說：「無論過去，現在，未來，均為在適當時期鼓勵並協助中國成爲一個統一富強而能够合作的國家，並有一個建立於民主原則與人民主權基礎之上的政府。」

所以目前中國的民主政治問題，上有蔣主席一再聲明與督導，外有盟邦美國的明確鼓勵與協助，都希望我們能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獨立富強的新中國。這真是千載一時的機會，不容再緩了。倘若再或因循苟且讓官僚政治去縱橫捭闔此爭彼奪，視政權爲兒戲，敷衍下去，失此良機，則中國前途何堪設想。蔣主席在中國之命運中也叮囑民衆，指出「今後的政治建設，應以國民奮發其自主自動的精神爲基礎。」所以在目前環境之下，極須要民衆奮發其自主自動的精神，來爭取來培植這民主政治，也只有民衆奮發其自主自動的精神，民主政治才可實現。以前全國各地時起時伏的民主呼聲，好像細小的火星，無以爲濟，現在我們要集中全國力量，共同奮發努力，使四散的細小的火星，集成光芒萬丈的大火炬，來映照這燦爛光輝的神州，爲民族前途放出無限光明。所以我們爭取民主政治，是現階段中最迫切最嚴重的問題。但是民主的本質是什麼？各國民主政治的經驗是怎樣的？我國過去的民主政治何以失敗？民主政治與人民生活各方面的關係是怎樣的？我們又怎樣使全國民衆能運用民主政治來建

設新中國？這許多問題，都需要參加民主運動的人民大眾，大家努力檢討的。

真正的民主，不僅是「一人一票大家平等」的傳統式的民主，也不是要求犧牲少數來服從多數的機械式的民主。真正的民主，是各個人在團體中互相影響，互相創造，由矛盾而造成總合的集體。有集體才能有民主，同時也因為民主，才能速成集體。集體的意見，就是民主的意見，集體的意志，就是民主的意志，集體的精神，就是民主的精神，而集體的力量，就是民主的力量，集體越能團結，民主越能開展。

民主不是別人授與的，民主是人民在集體生活中自己創造的。讓我們用最簡單的委員會來做譬喻罷。這個委員會的主要目的，是要尋出共同的意見，去共同辦理大家要辦的事件，這是大前提。我參加委員會，不專是供獻我的意見，倘若專門供獻意見，我可不必出席，只寫一份意見書去就行了。但是我也不僅是去聽取別人的意見的，倘若這樣，我就請每人給我一份意見書好了。我們所以勞師動衆大家參加會議的緣故，就是要大家創造一個集體的意見。這個意見不獨比每一個人的個別意見好，而且還大於各個人意見的總和。因為這個集體意見，是各個人的交流互感着發揮出來的，大家都有一份在裡面。而各人所發揮的，也不僅是他本來想到的，而大部份是在討論中受了團體中各人的啓發而產生的。同時反過來，他的意見，又啓發了在座各人的思維。譬如甲發表的意見，引起了在座各人乙丙丁的新意見，而乙發表了由甲啓發而想到的新意見，對於甲丙丁的思維上又起了作用，這樣不斷的

進行着，結果產生了一個共同的集體意見。在這個意見中，各個人的意見都充分地代表在裡面，但要分析這集體的意見，去辨別那一部分的意見是屬於那一個人的，這是絕對辦不到的，因為這是集體的。而有了集體意見以後，各個人也決不想去辨別他個人的供獻，他對人講的時候，很自然地說「這是我們的意見」而他就是「我們」中分不開的一份子。

在這集體過程中，最主要的先決條件，就是每人應當各竭其能各盡其職。倘若有人在討論中，故意講究禮貌，而自動取消自己的意見，這是規避責任，不獨自己不能在集體中代表着，而且損害集體的發展這是損失了民主的充分表現。倘若有人以為「別人可以比我做得更週到，用不着我參加的。」這不是怠惰，就有誤會了。是的，團體裏各個人的意見，或許比你個人的意見高明。但是主要點不在這裏，不是各個人的比較。主要點是我們聚在一起大家參加，大家供獻，各人應當盡量參加，在參加以前，你或許自己覺得沒有供獻，但在討論的過程中，只要你努力，你當然會受討論的啓發，而有新供獻，凡是參加過討論會的，都有這樣經驗的。俗語說「三個臭皮匠，勝過諸葛亮」就是這個意思。

有的人在討論過程中，要堅持自己的主張，用種種方法，使它通過，這不是民主方法，就因為這不是集體的主張。同時，多數的意見，並非集體的意見。譬如我與甲乙丙丁五人在會議中，倘若我得了甲乙的同意，就可以有三人，作為多數通過。但是，這是機械式的，丙丁就沒有代表在裏面。就是全體通過了，而其中有一兩個人懶得參加討論，只是舉手贊成，這種全體的意見，不是每人盡量參加

造成的共同意見。各個人不能被動，所有的人都要主動，才能交流互感，創造出更偉大的共同的意見。倘若各個人分頭比較個別的意見，就不是共同的思索與討論。最主要的是如何各盡所能，去討論出合乎大家需要的結論來。在討論過程中各人在那裏供獻，同時各人在那裏學習，各人發現各人不同的意見，而將各人不同的意見交織着，綜合着，統着一着，成功一個集體的意見。這種對立的統一，不是互相讓步調和的統一，而是互相爭取的統一，是新的集體創造，是真正的民主的表現。舊金山會議中所用的「否決權」，五強之中，有一個強國反對，議案不能通過，就是反對多數通過，要企圖產生更民主化的集體的意見。根據十月二十六日文匯報的重慶航訊說，重慶將近開始的各黨派的政治會議，也仿照舊金山會議中所用的「否決權」，派有五個代表以上的大黨，將均有此權。一案付表決時，如有一黨投否決票，全案即不能通過，這也是民主化團結統一的企圖。因為會議的目標團結統一建國，在這大前提之下，只要大家努力討論，一定可以得到大家同意的集體的結論。

所以會議的功用不僅是聽取不同的個別意見，而是去融會貫通各種不同的意見，在共同目標之下，創造一個總意見。各人的意見，不是固定的，而是受集體融化的。只有這樣各竭其能，各盡其職的討論，才能互相影響，大家興奮。在這樣團體討論中，臨時一人離席，或加入，整個場合就多少會有不同的感覺。這就可表示一人的變動，就可影響集體。當集體的意見創造成功以後，參加的各人，在思維上與意見上，就有了新的開展。而本有各人的磨擦與衝突，也就無形中煙消雲散了。只有這種

民主的過程，才可以解決許多各個人_們在社會上與政治上無聊的私人黨派鬭爭。

普通在討論會中，就怕意見分歧，得不出一結論，其實真正民主的討論，就重在歡迎分歧的意見。因為各人意見分歧，才可各有供獻，才能在所討論的大問題之下，交織融會成一個更豐富的綜合與統一。所以討論的要素是在由分歧中創造一致以便「殊途同歸」。各個人聽見不同的意見，就要想到「多麼有趣呵，這個問題有各種不同的方面，我所知道的僅是一方面，現在他給了我另一面的看法，同時因為他的啓發，使我連想到還有其他方面。」這樣越討論，越使問題的內容豐富，所以集體討論的目的，就在乎「拿出你的不同意見，加上我的不同意見，大家將各種不同意見交織着，融會着，影響着，創造出一個更大的一致更大總和。」有不同的對立，才能創造更大的統一。而集體的意見，不是各人個別意見的總和，在集體中已生出新的力量，比個別意見的總和，更大得多，而且不是數目字可以表達的。因為在討論過程中已起了質的變化，而參加的個人，在集體中已有進一步的表現，這種集體的意見，就是民主的意見。

各人在自由討論的集體的過程中，就容易互相瞭解，互相同情，於是就有了互信，就可同心協力互相切磋；而且可以做到一心一德的共信地步，這是大家創造的集體的意志。我們在團體日常生活中，大家一起演化出一種共同要求的社會意志。而各人的個別意志，自然而然寓於集體意志中。所以創造集體的意志，是集體意見進一步的表現。有了集體的意志，每一份子就能够與大家配合着，根據這

個共同的意志而努力而奮鬥而犧牲。抗戰時期有許多人民所以願盡全力來共赴國難，就因為大家有了抗戰的集體意志，大家才能捨小我而為大我共同努力。現在建國開始就更需要全國人民共同長期努力建設，所以也就更需要民主團結了。

但意見與意志的統一，還不過是民主過程中的一部份，進一步就能產生集體的情感，就是集體精神，在軍隊中就叫做士氣。在人民大眾叫做民氣。這種集體精神在抗戰期間所表現的就是同仇敵愾同舟共濟的精神，使民族自尊心藉此提高。使抗戰信心藉此堅定。在建國期間所表現的就是堅強奮發的精神，百折不回的克服艱苦為祖國前途努力。蘇聯建設幾個五年計劃時，人民瘋狂似的努力，就是這種精神。但是這種民族精神不是神秘的魔術，可以用法術召來的，也不是三申五令就可產生的。這是集體的精神，是人民在集體中自然發生的真誠純一的精神，沒有集體，就沒有這種精神。

隨着集體意志與集體精神發揮出來的，是集體的力量，就是普通所謂「群策群力」。這種力量，先要將全國人民變成一個大集體，大家起來，才能打通政府和人民的意志，集中政府和人民的力量，而這種力量是龐大無比的。但是直到現在這一種力量，還沒有發揮出來，直到現在，大多數人民，對於建國還是漠不關心，還覺得建國與他們沒有切身的關係，他們沒有組織起來成為集體，也沒有機會參加建國的計劃，因此對於建國的使命與前途，還沒有瞭解的機會，那裏還談得到發揮這偉大的集體力量。等到每人能夠有機會參加了國家大集體的生活，使他們覺得是民族中分不開的一份子，使他們

明瞭建國的需要，明瞭國家前途的光明，就是他們的光榮，他們對於建國的努力，就覺得忠難與同榮辱與共，而變成自動的迫切要求。所以只有在民主的集團中，各個人才能集中意志，團結力量，一心一德，爲國家效命，發揮偉大的集體力量。

由上面的討論，我們知道民主不是一種格式，不是一種老死不變的制度。民主是一種方法，一種過程。民主政治，不僅是政權的分散。由寡頭政治分散爲全民政治，民主又是一種集中的過程，使全國人民團結爲大集體。使四萬萬五千萬人民變成一個人，使各人的意志與力量變成一個集體總意志，一個集體的總力量。其實民主不僅是分散，也不僅是集中，而是一個創造的過程，民衆靠着它來統一全國人心，團結全國意志，增強政府和人民的力量。民主政治，不是由立法來造成的，立法不過是民主的端倪。民主政治是在集體生活中養成的，民主的使命是開展人們潛在的創造力，而這種創造力，只能在民主的集體生活中開展出來。

人民需要的是什麼

史

篤

人民，不斷呼救求救苦救難而永遠受苦受難的人民，決不再需要苦難了。

物價幾何級數式的上漲，日夕焦慮着糊口之計，今天填飽肚皮却不知道明天填肚皮的東西在那裡，——這不是人民所需要的。

老爺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大脚色豪奪巧取，小爪牙氣勢凌人，穿了制服，搥了符號，甚至祇拿了什麼卡片，就可以橫衝直撞肆無忌憚，這，也不是人民所需要的。

人民不需要極少數人花天酒地，大多數人啼飢號寒，眼看着滿倉庫、滿櫥窗的貨物，自己想買一樣却不能。

人民不要大中小各級學校使他們的子弟生可望而不可即之感；不需要從事所謂神聖的教育事業的教員們束緊了肚皮上課，力竭聲嘶，東奔西走，還籌不到自己子女的教育費；不需要青年們幸而跨進了某些堂皇學府的大門却祇是浪費光陰毫無所得。

人民不需要無能無德的「親戚」、「同鄉」、「某某面上人」把持了大小職位，却讓真正的人才向隅；不需要因人設事，公私不分，家天下、家機關、家學校；不需要小舅子、姨太太、少奶奶、甚至小舅子的小舅子、姨太太的小姊妹、少奶奶的汽車夫，來予取予奪。

人民不需要汹涌的失業的洪流；不需要停工、關廠、倒店；不需要流氓地痞所組成的，今天東明天西的所謂部隊來明搶暗搶，綁票殺人；不需要農村荒廢、農民被壓迫、農產品被掠奪。

人民更不需要自己愛讀的書讀不到，愛說的話說不出，愛辦的事情不能辦！

那麼人民所需要的是什麼？究竟是什麼？

是不是那些動人的綱領和議案？

是不是那些疊如山積的佈告和條文？

是不是那些「改善民生」「實行民主」的皇皇演講和宣言？

不是的，不是的！一切空頭的諾言和保證，人民已經接受得太多，再也不需要了。

人民所需要的是實質的幸福和自由！

爲，不是你們的名義而是你們的實質。打個譬方說，假使國民黨是好，共產黨即使打倒了今天的國民黨，將來的國民黨還是要復興的，那怕換了人員和名稱；同樣的，假使共產黨是好，國民黨今天即使撲滅了共產黨，將來還是保不住江山。這爲什麼？因爲「好」是人民的要求，而這要求是必定要實現的。否則人類不會進化到今天，否則希特勒不會敗亡，否則抗戰不會勝利，否則歷史上一切野心家的事業也不會空餘陳迹。今天人民已經很清楚的看出內戰的實質，是好與壞之戰，至少是比較好與比較壞之戰，是黑暗與光明之戰，至少是比較黑暗與比較光明之戰。人民將以全力來維護好與光明，

「不管你們那些「理由」和「罪狀」，也不管你們的在朝黨的正統和顏面，在野黨的委曲和不平，因為人民所需要的祇是實質的幸福和自由！」

可是人民今天還沒有做下斷然的結論。人民今天還沒有說：你好，我們擁護；他不好，替我滾蛋！這是國共兩黨都看得出的事實。這也是為什麼人民呼籲反對內戰的原因。這也是國共兩黨爭取民心的絕好機會。人民並沒有認為國共勢不兩立，人民並沒有必須在二者之中捨棄一個的意思，除非你們自己逼得人民非如此不可。而當人民的決意已經立定之後，被棄者再後悔今天的錯誤就來不及了。

可是今天的確不乏將來要追悔莫及的人。他們諄諄告誡人民不要被別人利用，好像應該被他們利用才好。他們並不研究自己有什麼好處、什麼壞處，別人有什麼好處、什麼壞處，他們心目中祇有一個觀念：有我就沒有他，有他就沒有我。

凡是你做的就都不好，凡是我做的就都好。人民指摘我的缺點，當然是反對我；人民稱讚你的優點，也就是反對我……

殊不知人民所需要的却不在於是你的商標還是他的商標！

人民所需要的是什麼？人民所需要的是安定、和平、發展的生活，所需要的是民主健全的政治，所需要的是赤心為國為民和人民同甘共苦的官吏，所需要的是正直、刻苦，進取的風氣，所需要的是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治安，所需要的是有充份保障的人權自由！

奉勸真正的有心人，拿事實出來！

歐美的民主政治是怎樣開展的

嚴 景 曜

上一次我們討論了民主的本質，把澈底的民主與形式的民主檢討了一下。現在我們要討論各國的民主政治的經驗來研究歐美各國及蘇聯所實行的民主政治是怎樣的。這種經驗，對於中國實行民主政治是值得參考的。本文專討論歐美的民主經驗。

我們從歷史上知道民主政治，是推翻封建制度後取而代之的一種制度。而民主政治的形成與社會上經濟制度的變遷是分不開的。歐洲封建主義的經濟組織，大致也和中國封建社會相仿，以農業的自給自足為原則，生產與消費也都限於地方性的，這本是維持封建領主地方分權政治制度的經濟基礎。但在十五六世紀以後，手工業與商業漸漸發展，到後來貨幣資本起了很大的作用，生產及交換的關係，逐漸擴大為全國性了，於是破壞了土地資本的經濟組織，而封建政治也漸漸不能控制全國性的經濟組織與這新興的資產階級。因為經濟一有變動，則全部巨大的上層建築必跟着發生各種不同的變化。所以這新興的資本主義的經濟關係，就產生了新的政治組織的要求，且由新的資產階級起來組織政治機關。我們知道當時在封建制度崩潰的過程中，資本主義式的生產已建立了相當的基礎，並且發展得非常迅速，同時資產階級所領導的革命力量，可以壓倒封建貴族，所以產生了資產階級的民主

革命。

例如英國在十七世紀初就開始了王室與議會的鬭爭，當時就提出「王與議會，究竟誰是支配者」的問題，新興的資產階級隨着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在政治上開展了劇烈的鬭爭，內亂多時，但是國王貴族終究壓不住日益強大的資產階級，到十七世紀末年，國王查理二世不得不允許議會所擬的「權利宣言」，奠定了英國民主的基礎，使議會成爲支持并擴大資產階級支配權的機關。同時也爲各國民主政治的起源。

美國獨立革命，是在美洲的英國資產階級，反對本國英王政府所採用的重商主義經濟政策，壓迫美洲殖民地而起的革命，當時發表獨立宣言，並有「人生而平等」，「不自由毋寧死」的民主主張。獨立成功以後就建立了民主的合衆共和國。

法國的民主革命鬭爭，較以上兩國更爲劇烈，流血的時間也較長。法國資產階級，從美國的獨立運動中直接學了不少經驗，對本國封建貴族爭取政權時，也盡量應用了美國獨立時所採取的戰術。同時高唱天賦人權論，國民會議發表人權宣言，主張「人類的權利天生平等，而且永遠平等。」雖在鬭爭中經過不少的曲折與流血，但是資本主義的發展在當時是無法阻止的，而隨着資本主義開展的民主運動，也就無法抵抗了。許多法國貴族盡力要逆轉歷史的車輪，結果把自己都葬送在無情的歷史車輪之下，民主的法國終於實現。

此後其他各國也相繼走上了民主政治的大道，但當時各國所建立的民主政治，可說是資產階級的

民主政治。雖然那時民主革命所標榜的是全民的自由平等與博愛，但是政權建立以後，所享受的，不是全民而是資產階級。他們當時所以用全民的口號來號召革命，是因為他們自己的力量，還不足以推翻封建勢力，一定要得到民衆的援助才能做到，而同時有的民主政權，也向全體民衆開展着，如選舉權等，在革命成功後不獨資產階級有選舉權，而全體民衆也得到了選舉權。勞動大衆之所以擁護資產階級的革命，因為在封建制度崩潰的時候，能够取而代之的制度，在歷史的條件之下，只有資本主義，而資本主義初期發展的時候，資產階級是有進步性的，他們當時的呼聲，尙合大衆的需要，而勞動大衆，也因之漸漸脫離了農奴的束縛，而轉變爲行動較爲自由的工人。但是革命成功以後，所有爭取來的民主政權，大多旁落在資產階級手中，一切民主的設施，如言論出版的自由，只有資產階級可以享受，因爲只有他們握有生產工具，連生產言論的工具也包括在內。表面上雖有全民民主政治的形式，而其內容已變成資產階級自由採取的政治工具了。其實澈底的民主制度，在資本主義的階級社會中，本是不可能的。

但在初期的民主政治制度之下，勞動大衆所受的壓迫，還沒有像後來那樣嚴重，他們還有在某種程度內，可以根據法律，組織自己的政黨，爲自己生活的改善而奮鬥，而資產階級也往往用「社會改良政策」自動改善些勞動大衆的生活，藉以阻止勞動運動，像德國俾斯麥的政策。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可是後來在自由競爭的過程中，資本集中起來，到了後來變爲資本主義末期的壟斷制度，產生了

卡特爾，幸狄加與托辣司等經濟組織，產生了財政巨頭，而同時也產生更嚴重化的經濟危機與更尖銳化的階級鬭爭。在這種情形之下，國會的民主政治，漸漸已不能做資產階級榨取的工具了，因為在資產階級方面，一派政權，為金融巨頭所操縱，有了座談會式的國會，反而不便，而對於勞動大眾，從前用來阻止勞動運動的「社會改良政策」已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他們的代表，已漸漸走進國會，運用資產階級本有的民主政治工具，作為武器而作劇烈的鬭爭。於是資產階級漸漸取消了本有的民主政治的機構，或者授大權給內閣或總統，或者在內閣之內，再有少數巨頭會議，決定一切行政方針，使國會等於虛設，而更反動的德國與意大利資產階級，對於日益抬頭的勞動大眾，感到極度的恐慌，簡直實行法西斯獨裁，完全取消了民主政治。

法西斯國家，因為內部矛盾加深，不得不繼續對外作劇烈的侵略，掀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於英法蘇聯等民主國家，給了極大的威脅。但是這次戰爭的本質，倒是一次新的革命。在這劇烈的血戰過程中，不獨使各資本主義的民主國家，聯合起來，並且聯合了全國民主的蘇聯，會合成偉大無比的民主力量，一面在國際上打倒了血腥猙獰的法西斯主義，一面在各民主國的本身，也引起了質的變化，由此產生二種結果：第一是資產階級獨裁的民主政治不堪維持局面，不得不有所改革，而為人民大眾所歡迎擁護的各進步的黨派，相繼而起。第二從法西斯桎梏中解放出來的許多民族，大多已在更廣泛的民主基礎上建立新國家。這樣的結果，在整個民主運動上，有了進步的開展。

試看法國戰後的普選，與戰前的選舉，在民主政治上有根本不同的表現。戰前法國的大政黨，都是受資產階級所操縱，所謂工業金融大王們，即所謂「二百家」，是真正的法國統治者。不論那一個政黨起來組閣，大工業家和大金融家就是他們的後台，就是他們的牽線者，他們主宰着法國整個的內政外交政策，同時還培植法西斯勢力，縱容它用暴力來威脅來打擊人民大眾，分散和摧殘人民陣線，懈怠國防與法西斯妥協。等到法國淪陷後，這一批工業金融家的真相更形暴露出來了，他們就公開狼狽爲奸出賣本國侵略者積極合作，來保存自己的財產和地位，同時壓迫人民大眾拚命阻撓法國的民主復興。但是法西斯被打倒後，他們本身也站不住了。這次普選的結果，使戰前最有勢力的赫禮歐和達拉第的政黨，遭到空前的覆滅性的慘敗，而爲人民奮鬥的三個進步政黨，如共產黨，社會主義黨及人民共和黨，大受人民擁護，在選舉中獲得空前勝利，這是法國人民意志和願望的真正表現，也是法國民主政治進一步的開展。

英國所表現的，雖然沒有像法國那樣澈底，但是民主政治在戰爭過程中也不能說沒有進步。戰前的保守黨，是以「綏靖主義」，在國際上放縱希特勒擴充勢力，在國內內容忍本國法西斯黨耀武揚威，雖在戰爭時期，保守黨也歷嘗艱苦盡了克服強敵的責任，但終究在戰後普選中被人民無情拋棄由工黨取而代之。雖然英國工黨沒有像法國幾個人民大眾的政黨那樣澈底，但是該黨政策所表現的民主精神，較諸保守黨，有着顯著的進步。

至於從法西斯桎梏中，解放出來的許多民族國家，他們民族解放運動的基礎，也就在反法西斯戰爭中奠定的。當三巨頭在克里米亞會議的時候，大家決定必須幫助歐洲各解放國家的人民「用民主方式解決他們在政治上及經濟上的各項迫切問題」。並且確定政策，「使各解放國家的人民能夠消滅納粹主義及法西斯主義的最後形跡，並在他們自己選擇之下，建立他們的民主制度。」「一切民主份子的代表，廣泛參加，保證儘可能從速以自由選舉的方法建立對人民意志負責的政府。」所以歐洲被解放的民族國家，有了克里米亞會議的保障與協助，人民大眾盡量用民主方式，從法西斯暴政之下，解放自己。其解放的方式，也各國不同。有一種是統治政黨，在反抗法西斯的鬭爭中，訓練了自己，不斷進步着與人民大眾聯合起來，建立廣泛的民主政府，如捷克總統所領導的政治團體，就是這種代表。有的國家的統治者，在德國法西斯拔扈的時候，不是暗送秋波，就是甘心降敵，參加法西斯打擊民主國家，同時還用武力來鎮壓本國民衆，但是不等到法西斯德國崩潰，這種傀儡統治團體，經不起民主力量的打擊已先後失敗逃亡或傾倒了，而人民大眾，在反法西斯的鬭爭中，已經強大起來，同時籍着民主國家的幫助克服困難擊潰本國的法西斯控制，在廢墟中建立起燦爛光輝的民主政治，例如波蘭，南斯拉夫，芬蘭，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以及挪威等國都已或多或少地拋棄了舊有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而進行着更廣泛的由進步黨派領導着的民主政治。

但是開展廣泛民主運動的過程中，不是沒有阻礙的，例如美國的非列賓已在戰爭中解放了，但是

歐洲各國所有的殖民地至今還沒有獲得解放，在亞洲有英屬印度法屬越南荷屬印度，好像他們是民主運動的化外之民，大西洋憲章與三巨頭會議的民主自主的原則，以及聯合國的宣言，好像都不能適用，但是他們得不到解放，廣泛的民主運動是不能順利開展的，同時這次戰後的民族自主運動，也不是武力可以鎮壓下去的。所以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與歐洲廣泛的民主運動，是分不開的，應當配合着一同開展才能達到真正廣泛的民主政治。還有一種民主運動的逆流，就是歐美獨立國中還存在着法西斯傾向的西班牙與阿根廷等國。以前他們是直接受着德意法西斯的援助而拔扈着，而至今還是法西斯德國的遺逃藪，現在民主國家，在這次戰爭中，一面消滅罪魁禍首的德意法西斯，一面在本國內也漸漸努力剷除着本身的法西斯傾向，加強了民主政治，而西班牙阿根廷等國，目前已失去依靠，只要各民主國在剷除法西斯根源的共同目標之下，再能繼續努力合作，這種已失去原動力的反民主小逆流恐也不難肅清的，但聯合國非作進一步的努力不可。

這次廣泛的民主運動中，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各國進步政黨的宗派性已沒有以前那樣濃厚，使各黨易於合作其實這也是廣泛民主運動中必要的條件。以前共產黨與社會主義黨，是絕對對立的，他們一面反對資產階級，一面自己互相攻擊，結果，把人民大眾的力量，因此分散，使法西斯主義更易猖獗，雖然當時法西斯的威脅，日益厲害，統一戰線的聲浪也隨着高漲，但是各進步黨終不能密切團結互相合作。直等到法西斯德意大軍直壓國境以後，才手忙腳亂一敗塗地，這個慘痛的教訓，逼着民主

各國，不得不承認團結禦敵的重要性，在當時的環境之下，民族的利益高於階級的利益，人民大眾的各黨派更非密切合作不可，以前的宗派性，根本變爲團結的障礙，也隨着戰爭的要求而加以糾正與拋棄，勝利以後，各國艱鉅的復興工作，仍要求進步黨派的密切合作，不許有無謂的宗派之爭，故民主運動，也因之開展着。

綜觀歐美民主運動的歷史，可以分爲三個階段。第一是資產階級推翻了封建制度而產生了資產階級性的民主政治，當初人民大眾一部份的利益，還可代表在裡面，到後來資產階級的政治漸漸獨裁化而威脅民主。第二是法西斯主義的產生到侵略戰爭的爆發，那時是歐洲民主政治最危險的時候。現在第三階段是法西斯的崩潰，與法西斯勢力正被肅清的時候，歐美各國在消滅法西斯殘餘的共同目標之下，使更廣泛的民主運動得以向前邁進。所以民主政治是一個歷史過程，決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是隨着歷史的演變而演變着，凡是阻礙民主大潮的人，結果終被奔騰澎湃的大潮無情的衝毀與消滅。同時民主政治也不是到時候就會自然出現送到人民手裡，必須人民大眾自己起來爭取才能實現的。只有人民大眾團結一致努力爭取，才能減輕與消滅各種反動勢力的阻撓與打擊，才能使民主政治發揚光大。

民主憲政的基本問題

平 心

實現民主憲政是戰後國家復興的主題。要使中國由落後的農業國蛻變爲新興的工業國，由散漫的人治國轉化爲統一的法治國，由潛能的強國進步爲實在的強國，除了建立全面的民主憲政外，實在沒有旁的捷徑。中國人民因外患內亂，因歷次革命失敗，特別是因日寇侵略，蒙受了無可計數的損失；所有這許多損失都將由民主制度的樹立而逐漸得到補償。事實上，不光是補償損失而已，一個名符其實的民主共和國體足以把中國引向頭等文明國家的地位，使這個東方大國在國際和平運動中起着真正的領導作用。假如說，抗日戰爭爲新中國奠定了廣大而堅固的初基，那末，民主憲政就將要爲新中國完成全部壯麗的建築物。

爲民主憲政擔憂的人當然不在少數。他們首先舉出教育不普及作爲中國不能實現民主的主要理由，認爲一個文盲占全體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國家不配走上民主道路。當然誰也不能否認教育落後是中國實施憲政的一個困難。但是過於誇大這個困難，拿它常作反對憲政的藉口，那就糟糕透了。依據已往的世界文化史而論，在無論那個國家，並非由教育規定政治的發展，而主要地是由政治規定教育的興衰。在封建專制時代的歐洲，教育文化跟政治經濟一樣，完全操持在僧侶貴族手中；那時教育的腐敗與落後，是歷史家公認的事實；就是這個事實也並沒有妨礙歐洲各國民主運動的成功。正是在各國建

立了民主憲政以後，歐洲的教育文化纔蓬勃發展。中國人民知識的低下，是長期封建統治與缺乏民主生活的自然結果。不能實現民主，一切教育興國之類的議論都必定落空，而國民的知識水準是永遠提高不起來的。說是一定要等到教育普及之後，纔能建設民主政體，那是等於說，一個因饑餓而衰弱貧血的尋常人一定要先服補血藥，使血液充分增加後，纔能飲食。在教育沒有普及之前，人們的生活利害與現實需要使他們自然而然的傾向民主。民主並不是什麼深奧莫測的神祕東西，而是同日常飲食一樣的平常。民衆也許懂得不得民主的高深理論，而這卻不妨害他們要求民主；正如他們也許不懂維大命的艱深理論，而這並不妨礙他們天天需要維大命一樣。歷史告訴大家，民主憲政與民主運動本身就具有教育民衆的巨大力量。

反對民主的另一部分人，認爲中國向來缺乏民主生活的習慣，把外來的民主政治移植到中國來，未免不合國情。這些人的最大錯誤，是在於把中國當作可以同世界脫離的孤立國家看待；而不知道，民主本不偏愛某些國度，而跟另外的國度合不攏來。它像日光一樣，可以照射一切民族。關在黑屋子裏的人，面色蒼白；只要打開窗戶，把陽光引到屋內來，就可以健康起來，他斷沒理由因爲陽光照過別的人家，就討厭牠的照射。就是在中國歷史上也並非沒有個別的民主事實與個別要求，不過因爲受到封建專制政治的重壓，一切民主種子都不易發芽，就算發芽了，也不能滋長繁盛。類似的理由也可用來解釋中國科學的命運。在中國古代，並非沒有科學的萌芽，只因爲壓在封建守舊的生產關係，政

治體制與意識形態的重重石塊之下，抽不起條來；就算曲折地從石縫裏抽出苗條來，也長不大。若果不能因為中國缺乏成型的科學傳統而反對科學從外國輸入，同樣也就不能因為中國向來缺乏民主的生活習慣，而反對注入世界的民主潮流。正由於中國缺少這種生活習慣，就愈有採取民主制度的必要。何況我們所要求的民主，並不是要照抄外國的政治設施，而是根據中國具體的社會特點與現實環境來建樹，來擴充的。

實現民主的真正困難，不在於教育和國情等方面，主要的倒是在阻撓民主的勢力在中國特別頑強。抱住封建殘骸與特殊利益不放手的特種同胞，不願看見人民勢力的抬頭，懼怕人民的覺醒與執政，非竭全力反對民主不可。幸而反對民主的份子今天在國內社會力量的對比上，並不占決定優勢，而要求民主的浪潮却在一天一天的騰漲。這表現在各地民衆自發地要求自由權力的運動上，表現在各大小政黨的政治綱領上，也反映在政府允許開放言論出版結社自由保障人權召集國民大會之類的諾言與預定政策上。尤其要提起的是，多年來一直阻礙中國走向民主統一的日寇是被擊倒了，跟在敵人屁股後面戕害民主運動的漢奸也正在清算之中；同時，盟國不論朝野都對中國民主寄與殷切的期望，開明的友邦人士更表示願意支援中國民主的建立。凡此種種全是實現國內民主憲政的有力條件。

在這樣空前有利的條件之下，中國如果不能再走上民主的路，那真是太沒出息了；今後只好永遠處於被領導的地位，至多只能充當國際舞臺的一名配角。

如果大家決意走向民主的話，就不容許拿憲政當作裝飾品。要使憲政不變成點綴昇平的彩牌樓，而成爲庇護人民的大廈，首先就得避免過去憲法與憲運的弊病和缺點。從一九〇七年滿清政府發佈「欽定政法」和差不多同時以康梁爲首領的立憲的黨人要求實施君主立憲以來，中國先後有過不少次的憲法、約法與憲草以及更多次的憲政運動出現，然而每一次的製憲都不足以表現人民的民主利益與民主要求。清廷的偽憲與袁曹等的御用憲法不用說了，就是其他許多約法與憲草可以批評與商榷的地方也不少。至於歷來的憲政運動，直到抗戰以前，也很少能真正反映民衆的要求與利益。清末的保皇黨人所開的立憲運動不用提了，自民國初元以至「五五憲草」宣布以後，國內各方面對於憲政的關心與建議，也非常淡漠，而缺少生氣，這充分說明了過去的許多次憲政運動並未轉化爲廣大民衆運動。要免除過去製憲與憲運的弊病和錯誤，今後必須使憲政運動成爲高度的群衆化運動，使憲法與憲政成爲真實反映民衆的利益與意志的時代明鏡。把憲政看做少數人包辦的事固然極端錯誤，就是認爲由各政黨共同決定的事也不完全對。民主憲政的實施是人民自己的事，是生根在人民利益中，凡不以人民爲本位的憲政，凡限制人民權利不顧民生幸福的憲政，都不是名實相符的民主憲政。

中國的憲政制度應當儘量吸收外國的民主精華，只是不能機械地抄襲外國的憲政。國情論者藉口特殊國情反對民主的論調固然應予反對；可是凡理解憲政精神的人，決不漠視中國的特殊社會條件與政治環境。中國既不是資本主義國家，又不是社會主義國家，當然就不能產生英、美式的或蘇聯式的

憲政。在此時此地所需要的憲政，必須要針對重大的社會缺陷與政治缺陷，適合戰後復興的需要，引導人民走上團結建國的康莊大道。

中國人民除了抱有復興祖國的要求之外，還負有護衛世界民主和平的職責。今後的憲政自然必須貫徹這個精神。我們的最高國策之一，應當是除了自衛外，不參加任何對外干涉戰爭，並與世界愛好民主和平的國家合作，防止和制裁一切危害和平民主的國際侵略行爲，尊重世界一切民族的生存權與自決權。這些精神即使不一定要用成文規定於憲法中，却不能不體現在政權組織對外政策與國民教育等上面。人民在選舉時，就要考慮到，他們所舉出的代表是否能夠遵守這個國策的根本精神。凡違反這精神的代表與公務人員，應由人民或政府隨時撤回免職。

充分代表和反映人民的利益與意志，切合中國社會環境與團結建國的需要，貫徹保衛世界和平民主的精神，這三者應當是我國憲政的主要特點；這些特點自然是統一於三民主義的基本精神之下的。

具體說來，下面若干問題在實施民主憲政過程中必須求得合理解決。

關於憲法——憲法是憲政實施的標準。要建立憲政，需要一部最進步最健全反映時代精神與人民應要求的憲法。這部憲法要由最優秀最公正的人民代表與專家審慎起草，修訂，然後提交國民大會討論，通過，使成爲國家的基本大法，將來人民代表可經國民大會提議和實行修改憲法，但任何人不得違反憲法。關於國體、主權、領土、人民的權利與義務、國內民族關係、國民大會、中央政府、地方

制度、國民經濟、教育文化等項，在憲法上，都應有真正符合民主精神的周密規定。這裡特別要提出，關於人民權利一項，應採取憲法保障主義，而不應採取法律保障主義。對於侵犯人民權利的行爲，應設定制止條款。

關於國民大會——國民大會是產生民主政權的母體，它的召集應當經過充分籌備；它的代表應當由全國人民根據民主選舉法選舉出來，選舉法應兼採區域代表制與團體代表制或職業代表制之長，選舉舞弊，須嚴加防範與檢舉。國民大會應當討論並通過憲法，檢討過去施政，製定復興建國綱領，議決有關國計民生的問題，最後是選舉中央政府。國民大會是全國最高的政權機關，它除有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複決權外並應有決定國策、批准條約、審核政府施政方針、核准國家預算決算、調整國內民族關係、受理人民請願、監督憲法實施等權力。國民大會閉幕後，應設置駐會機關——常任委員會——其職權在：處理國家緊急事件，召集國民大會常年會議與臨時會議，監督並協助中央政府施政，辦理全國複決等。國民大會應每年召集一次，遇有國家緊急大事，得舉行臨時大會，大會代表任期不能超過四年，代表應對選民負責，選民有權撤回他們的代表。

關於人民權利——人民權利除規定於憲法外，應在實際上得到保障，在行政、立法、司法以至國民經濟教育文化各方面，都應切實貫徹澈保障民權解除民瘼的精神。人民除享有基本的自由權——言論、出版、信仰、結社、身體等自由——與各種政權而外，在生存權教育權等方面，也應獲得合理保障

。凡侵犯人民自由權利的行爲，應受嚴格懲處。在憲政實施後，所有政府公務人員都須養成尊重民權的習慣，而人民於珍重自己的權利而外，更應充分履行國家課與的義務。在國民大會召開以前，人民自由權利就應由政府切實保護，以爲實施憲政的準備。

關於政府組織——中央政府由國民大會產生，各級地方政府則由各級人民代表會議產生。各級政府既經選舉出來，就應對選舉機關負責，並盡量採納民意，以爲施政參考。政府公務員除一部分首要由人民代表機關選舉外。其餘應依據人才主義自全國賢能中選任，一切腐敗拙劣的份子應予裁汰。公務員應遵守法治精神忠勤服務，保護人民，凡違法瀆職損公肥私者都應受法律懲處。在憲法頒布以前，政府須嚴明整肅吏治，清除貪污以爲實施民主法治的準備。

關於地方自治——地方自治是民主憲政的下層基礎。健全地方自治，即是健全憲政的骨幹。在憲法頒布以後，應成立各級地方人民代表會議——省、市、縣、區、鄉的代表會議，這些會議的代表應根據各級會議選舉法由人民選舉出來，選舉法須偏重於職業代表制與團體代表制。代表對選民負責，選民有撤回代表之權。地方自治機構應監督地方行政，代表地方人民利益向政府提出建議。關於人民所受地方自治訓練，主要地應通過人民的實際生活進行，一切教育文化團體與社會服務團體應協助地方自治的宣傳與訓練工作。對於假借地方自治名義魚肉人民的罪行應嚴勵防止和懲處。由豪紳痞棍包圍壓迫人民的保甲組織應及早廢止。

關於政黨與民運——一切政黨應由法律確定其合法地位。政黨有參加競選，提出政綱之權，但不能直接干政。黨員應受所屬政黨的約束，不得有擾及人民的行爲。民衆團體不論屬於政治性的、經濟性的、職業性的、文化性的都應受合法保障。凡有利於政治革新，社會改進，民智發揚的民衆運動，由民衆團體指導，並應取得一切便利。在國民大會召集以前，由各黨各派和主要民衆團體的代表成立中央政治會議或國事會議，協商國事，也不失爲過渡時期民主憲政的準備。

關於國內民族關係——根據民族平等原則確定國內各民族關係，是建立民主憲政的一個重大課題。爲實現民族平等精神，必須棄絕大漢族主義，尊重邊疆民族，少數民族的生存權與自決權。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說：「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組織自由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這應當成爲處理國內民族問題的一貫方針。依據這個方針，國內各民族在政治、法律、經濟、文化上一律享有平等權利與自決權利；國內各民族依自由聯合原則組織民國。這些必須體現於憲法與全部憲政之中。

關於國民經濟與民生——民主憲政不僅是要保障人民在政治法律上的平等地位與自由權利，同時還要提高人民的經濟生活水準，健全國民經濟制度。不能改善國計民生，民主憲政就不會取得實質基礎。如果大多數人在經濟上依舊陷於困苦境地，決不能充分運用民權；如果國民經濟制度依舊停滯於落後狀態，就無從改造全國的政治文化。根據這個理由，國民經濟的重建與改造，應在未來憲法與施

政中占據特殊重要地位。爲大家熟知的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兩大原則描出了新國民經濟的輪廓。平均地權是要由限制土地私有走向土地國有，節制資本是要限制私人資本，使不損害國計民生，發達國家資本，使重要生產事業歸國有公營。與這兩大原則相關聯的改善民生辦法，也應在憲法上明確規定，並切實執行。例如關於工人，農民與一般社會服務者的生活狀況之改進，五五憲草所規定的各點似應加以補充。並於製定勞工法，土地法，農村經濟法等法規時，切實調查工農平民的一般生活狀況，具體規定保障勞動人民生活的綱目。

關於教育與文化——提高民智，改進人民精神生活，是完成民主憲政的主要條件之一。在實施憲政以後，國家應以全力推進和刷新教育文化。在教育方面，除確定全國人民教育機會均等的原則而外，必須做到……實施強迫教育，掃除文盲，使學齡兒童與失學公民分別免費受基本教育與補習教育，凡衣食不能自給的學齡兒童除免納學費，書籍費教育用品費外，得享受衣食費之補貼；凡有志受高等教育的貧苦青年得受資助。在專科學校與大學應多設免費學額。此外，如改革學制，整肅學風，重編各科教材，培養大量師資，推廣社會教育與職業教育，確定教育經費的最低限額與獨立保障等等都是改造教育的急務。雖不能詳細規定於憲法，但應具體列舉於教育計劃與教育法規之中，並切實依此推行。在文化方面，首先要解除文化事業的限制，給予學術，藝術，出版等文化工作以充分而有效的保障。各種學術研究，技工實驗以及其他有關國家建設的文化著作，應受獎勵與資助。國家須劃出一

部分文化建設經費有計畫地在各地興建和擴充文化學術機關及其設備。（圖書館，科學館，實驗室，文史館，博物院，古物保存所，美術館，音樂館，國立劇場，植物園，動物園等等）並獎勵私人與民間團體出資興辦此等文化事業。

以上是就有關憲政的幾個重要問題，綜合各方和本人的建議，提出簡要的解決原則，就正於國人。至於詳細列舉辦法，在此處是不可能的。如果這些原則能够全部具現於未來的憲政設施中，使中國早日擺脫舊的生活習慣，造成新的民族風氣，建設一個健全的民主制度，是斷無疑問的。

肅清貪冒是實民主政治的前奏

馬叙倫

五經是我幼時讀過的。毛詩裏有兩句說：「大風有隧，貪人敗類。」當時讀着，不見得怎麼；現在從社會的現象看來，覺得這兩句，真是「至理名言」呢。原來「大風有隧」意思是和空穴來風一樣，房子有了窟窿，風便從這裏進來了。社會裏有了貪人，社會便給他毀壞了。做詩的人定是根據他的經驗才這樣說的。

詩經裏還有一篇詩，題目叫做「碩鼠」，這篇詩的序裏說：「碩鼠，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碩鼠也。」奇怪呀，周書裏也有幾句說：「清明之日，田鼠化爲鴛，不化，國貪殘。」古人都把鼠來比貪人，當然不是隨便的。但是左傳裏有一段說：「有仍氏生女，甚美，樂正后嬖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婪無厭，忿類無期，謂之封豕。」却是把豕來比貪人。鼠和豕都是畜類，古人把貪人比做畜類，也就表明了貪人在社會裏是何等地位。老實些說，貪人是不知人道的，貪人敗類可說他是人類的大敵。

我們曉得豕是貪食的，也是極愚的：他吃得胖胖，只是供給人做食料。鼠呢，夜裏偷偷地出來覓食，見到人却就跑了。所以說「貪而畏人」。但是詩經裏又說：「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那末豕比鼠還好得多了。豕還有利於人，鼠只是害人的。做「碩鼠」的詩人正是有無限的痛傷罷！人呢，

明明是高等動物，有文化的，懂得社會組織的；但是詩經裏却說：「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這三章詩是最明白不過的，至少也是譏刺當時的貪人，那末把鼠來比貪人，還是看得起他呢！

論語裏說：「季氏富於周公，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求也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孔老夫子這樣地厭惡貪人，偏偏他的門下出了一個冉求去幫助貪人，爲之聚斂而附益之，那得不動了大氣？非但不承認這位「高足」，簡捷叫他的同學們「鳴鼓而攻之」。我們中國人不是都尊服孔老夫子的嗎？如今有了貪人，不應當做個「吾非孔某之徒而誰與」一齊起來肅清敗類的貪人嗎？

到底那樣地才叫做貪？我把劉熙釋名裏的話，來下他的定義。釋名裏說：「貪、深也，深取入他物也，」那末貪字譯作近代語，便是侵佔財物。所以莊子裏也說：「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不過莊子把他的意義範圍更放得寬大了。我記得左傳裏會說：「昔綰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爲盈厭，聚斂積實，不知限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謂之饜飡。」原來貪和饜飡是語源相同的，起初只是爲了過分要飽自己的肚皮，便去侵佔公共的食料，叫做饜飡。到了使用貨幣做交易的媒介物，便侵佔貨幣，叫做貪。到了侵佔欲擴大了，「無所不用其極，」便如左傳所說的不才子了。這位不才子最大的罪狀，是「不分孤寡，不恤窮匱，」本來貪人那裏會分給孤寡，憐恤窮賈，他寧可把棺材裹帶不去的財物，滿坑滿谷地藏起來，別人的凍餓是與他不相干的。他偶然被慈善

家說動了，拔牛身上的一毛，來佛身上裝金呀，放生池裏養幾條魚呀，刻幾部佛經，善書呀，施些茶水，薄粥，薄皮棺材呀，便是他的「皇恩大赦」，可是還爲了今生福壽綿長、子孫滿堂，來生不入輪迴、升往西方，並不會真真正正一念轉到孤寡窮困的身上。但是他們這些滿坑滿谷的積蓄，却是從孤寡窮困身上剝削來的，所以貪就是侵佔剝削的人名。

依照莊子裏的話來說，不但「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叫做貪，（貪冒古書也作貪墨，其實冒和貪是一樣的，冒是貪的借字，爲音韻學中說的「幽侵對轉」關係），無論什麼方面，離了本位，便侵入他方，卽便是貪。那末貪也便是野蠻的自由了。我們都明白，文明人的自由是把別人的自由做界限的。野蠻人方才只顧自己的自由，抹殺了別人的自由。可是話又要說回來了，據人類學家說來，原始人也各有他們行爲的規律，由社會制定了來約束社會裏面的個人，而且這種規律是很詳密的，所以共產主義反實行在古代的人類裏面；原始的共產主義，是把生活所需要的公平分配，不能侵佔的，那末野蠻人的自由到有界限的，貪人并野蠻人也不如了。無怪古人會把他們來比做豕和鼠！

從廣義的來說，從政府的領袖直到民衆裏面的一個，有一些企圖越出自己的範圍，損及他人利益的，便是有貪心，便犯了道德上的侵佔罪。如果有一件事實，越出自己的範圍，損及他人利益的，便犯了律法上侵佔罪。但是我們如今且不從廣義的來說；我們從歷史看到現實，便感覺到只是貪財的一件事，已經使社會國家受了甚大的影響。縉雲氏的不才子，是歷史上最初的一個貪財的。他既「不

分孤寡，不恤窮賈，」自然當時的社會受了影響，所以會送給他一個「饕餮」的綽號。從此以後，肉林酒池，玉杯象箸的桀紂，當然就是「碩鼠」詩裏的代表，連房洞戶，飛梁石礎，色含山藪，遠帶丘荒的梁冀，珍珠手串二百餘串整塊大寶石不計其數的和珅，是古今貪官的代表。最近清朝的文宗皇后那拉氏，臨朝執政，好貨不倦，各省的督撫每年必有「例貢」還要不時向督撫徵求。我聽說張人駿（？）做兩廣總督，有「內旨」叫他選造翡翠簪子，幾回送進去，都說不好，退了下來；張聽了他的幕客說話，格外進了十萬兩銀子，請那拉氏另外叫人採辦，却并原進的簪子都賞收了。張所派採簪子的一個知縣官，把剝下來的翡翠皮子，後來帶到上海，還賣了十幾萬銀圓，這時宗室（貴族）奕劻（慶親王）領袖「軍機」，（清雍正時設的軍機處，如宋朝的樞密院，現在的參謀本部，但清末的軍機領袖，如現在的行政院院長。）亦是眼見銀子會出血的。蔡乃煌送了三十萬兩銀子，便得補了「蘇松太道」，（俗叫上海道，是個最肥的官缺。）其他呢，我不糟蹋筆墨了，我且將李岳「瑞春冰室野乘」裏說的一件事，摘寫在下邊。他說：「政界之變相，始於光緒辛卯壬辰間，此後遂如丸走坂，不及平地不止矣。先是，輦金求官者，必資望稍近，始敢爲之，至是乃弛綱解駭，乳臭之子，汎掃之夫，但有兼金，儼然方面。……四川「鹽茶道」玉銘者，都下木商，……其謝恩召見時，……上晒曰：木廠生意甚好，何忽棄而做官？對曰：因聞四川「鹽茶道」之出息，比木廠更多數倍耳。……先是，有魯伯陽者，亦以夤緣得官「蘇松大道」，……先後運動費耗至七十餘萬。」這類的事，實在「書不勝

書」。但是當時有人調查奕劻存在外國銀行的財產，不過兩千多萬兩銀子，輿論已是極其唾罵的能事了。清朝政府如此，便促進了革命的高潮，清朝也就斷送了。

中華民國以來，由於北方軍閥的當權和清末不甚兩樣，大小軍閥之貪，若是奕劻還在，真要叫屈呢。據我游成都的時候，聽四川人說，成都城裏一半地皮，是某軍閥所有的；他的財產當然還不止這些。別的每個大軍閥，也有幾萬萬的財產，營長有了百萬以上的財產，口裏還嚷着沒飯吃。這些便是中華民國貪官的代表。

革命黨是要打倒這些豕和鼠、改革政治、替多數民衆做先鋒、做保障、做救星的。雖不必都是「兩袖清風」、「一擔琴書」和只飲些江水，總是應分和多數民衆一樣地生活。但十多年前我在一種刊物上見着說起革命黨的清廉，提到汪精衛只有十萬的財產，我不覺笑了。如果汪精衛家裏原有這些遺產，便不干革命黨的事。如果這是汪精衛因革命而得的，我們估計得出汪精衛在革命過程中所應份得的錢，那能便有此數？十萬圓在現在真真「不足掛齒」，在十多年前便不是少數了。這樣也可以驕傲而稱爲清廉嗎？但是在當時一輩革命大人物裡面，只有十萬的財產，的確要算清廉了。

十六年國民革命軍三路北進，沿途張貼標語，有「建設廉潔政府」一條。民衆看了那個不歡天喜地、引領翹足、盼望革命軍的早來；真有「後來其蘇」的情況！我在那時興奮極了，真覺得一個銅子都是民脂民膏，不但我不敢貪得一個銅子，還竭力地把脂膏節省下來，替民衆做些有益他們自己的

事業。但是後來看看，我真是一個傻子，標語只是標語，耳裡聽來總是些其人如今大不同了，洋房汽車都齊備了，南京上海都有住宅了，公司銀行董事董事長中也列入他們的大名了，外國銀行也有他們幾萬萬幾千萬萬幾百萬萬的存款了（曾見二十四年時某報）。我真愚笨，沒有研究過「暴發」哲學，起初只有瞪着眼睛望他們看看；後來曉得他們除了笑納許多孝敬外，（某省最高長官在戰區中吃的三五牌香煙都是開一張條子叫人家代買，起碼每次二三十筒，結果是被人家孝敬了，大概只算是小意識吧！）耳上不斷的靠着電話機，聽交易所的消息，尤其是掌握着財政機關的，「近水樓臺」，「多財善賈」，幾分鐘便發了大財了。

等到「七七」和「八一三」以後，我又發傻了，我以為「毀家紓難」的必定是他們「袞袞諸公」，必定不斷地有消息來打擊我的耳鼓。但是怎樣呢？只聽見說官也多發「國難財」了，在陪都的馬寅初博士真「慙大」，揭發了某當局貪污的劣蹟，被充軍式的叫他離開重慶開住起來。然而事實還是事實，某當局畢竟給「清議」抓住了，幾百個參政員沒有一個替他解圍，終於離開政府了。然而某當局已作了國際間的大富翁了。其他的又怎樣呢？

東觀漢記裏說：「馬援平交趾」上言：「太守蘇定張眼視錢、噪目討賊、怯於戰功。」原來苟卿曾經說過：「勇而不見憚者，貪也。」這是哲學上必然的定理，要錢的人那裡會去打死仗？自然敵人也怕他的勇了。撼不動的「岳家軍」，只是一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兩句標語收來的效果。那

時武官恐怕還少抓錢的機會，所以岳飛只說「文官不愛錢。」如今只聽見某處某處的武官都在那裏做「物質交換」，所以武官也有發「國難財」的了。那末打一路退一路，或者未必完全由於敵人武器的利害吧。

「物質交換」是打仗時不得已的辦法，如果「赤心爲國」，「涓滴歸公」，國家得的利自然多，受的害自然少。但是此次戰事裡情形怎樣呢？「物質交換」大概多變了私人貿易；在十二月八日以前，安南的海防，是運輸的要道，重要軍用品的鑄，真是堆積得如丘如陵，但是輸運工具都給物質交換占用了，這交換的又是某某當局某某大老某某資本家的私貨。到了十二月八日事起，不須說，這大量的鑄，歸入敵人倉庫裏去了。還有並非和敵人交換物資，而因輸運工具儘先供給某某當局、某某大老、某某資本家貿易去用了，把堆積得如丘如陵的軍用品「一掃而空」。如滇緬路遮敷一段裡，在遮放失掉以前不久的時候，大量重要的軍用品擱置長久了，保管的人曉得要出毛病，寫了「說帖」，送給主持的長官，請他趕緊設法搬開；長官正在那裏忙他的貿易，那裏顧到這些，結果軍用品自己爆炸了，損失三萬萬元以上。這位長官受的處分只是一頓罵，如今可也得勝利勳章了。

噲，噲，我也算說破了。恐怕他們要來向我討憑據呢。可是二十年來，省政府的糾舉貪官，如風毛麟角的難得見到，監察院的彈劾侵佔也和白雪陽春的難得聽到；那末如今的政治，真「與三代同風」嗎？但是鄉村裏的民衆，都「舉疾首蹙額而相告曰」：「吾族無醜類矣，我們苦貪官！」都市的民

衆也都「舉疾首蹙額而相告曰」：「吾族無職類矣，我們苦貪官！」我們如果和他們談談，都能滔滔不絕地說上一大套，如果向他們要憑據，他們都又瞪着眼睛拿不出來。如果這樣地告到官去沒有憑據，照例不準，還要辦「誣告」罪哩。但是他們泣血推心指天誓日說，他們不會寬人的，也不會說謊的，這也真須原諒的呀。現在的貪人，手段真巧妙呢！拿了人家的錢沒有把柄給人家拿住，那末要憑據從那裏來？所以省政府也沒法糾舉，監察院也無從彈劾，所以貪官也居然變了「弊絕風清」，但是「一路哭」了一路又哭了！

我們不幸而留在淪陷區的上海，也想做些「居者」的工作，然而苦得要死；穿破了連打補綻的布也沒有，吃完了連充飢的糠也貴來西，（自然有許多除外的）但是我們眼見得馬路邊紅樓參差，綠樹蒼蒼，一座一座的大廈，被人家「指而目之」說是偽政府某某官吏的住宅。但是他們自己都會表白過怎樣清貧的家世；那末這一座一座的大廈是怎樣來的？我又等於直接的曉得某局長車馬盈門、公開「諧價」，某局長鈔票不進，公事不出，我還聽見珠寶商人說，頭等的金剛鑽，翡翠，珍珠，都是先送到某某公館裏去的。兩年前一位文具店的先生告訴我，某太太替他先生化二十四萬元買一對鋼筆送給「友邦」朋友。這些頭上頂着偽字招牌的好漢，當然「慙不畏死」，豫備「身入囹圄」什還事也幹得出，區區貪字不在他的眼角裏。如今懲辦漢奸了，也不須我們再來饒舌。但是……

我們不要只注意到官吏的貪冒呀！官吏不是社會的中心。官吏的貪冒，往往也由社會造成的。例

如一縣地方，來了一位縣長，本是風骨峻峻的，但是不到幾月，便會成了貪官。因為縣長辦事，要得社會協助的，可是地方上早有一班富或貴的所謂「紳士」們包圍着他，你要辦你的事，須得聽我的話，否則叫你辦不成。因此白日求情，暮夜請託，起初送點禮物，叫你不可却，後來便互相不客氣了。這靠「紳士」們爲些啥呢？無非爲他自己生命財產關係，等到官紳「水乳交融」，便是一般民衆的「晦氣」到了。

再說自從提倡發展工業以來，大小資本家格外抬頭了，本來他們從勞苦工人農民身上剝削財物，做成了「富家翁」，他們住的是高堂大廈，着的是呢絨綢緞，吃的是中西大菜，使用的七奴八婢，但是他們那裏會「知足」呢？他們要錢，真如韓信帶兵「多多益善」。雖然他們裏面也有「深知大義」同時努力社會事業的，但是總在少數。他們平常非交結官場不容易達到他們的目的。等到他們積聚資本到了相當程度，正是應了「長袖善舞多財善賈」的古話，四方八面兜得轉，甚至政府裏閣老也會「移尊就教」，政治的機括隱隱地操在他們手裏了，給予了這輩人剝削農工的機會也更多了。結果鬧成官即是商，商即是官，一般民衆要受兩重剝削，真是「厭厭無生氣」了。

自由資本主義的國家，他的政治的後幕，也是資本家主持着。但是若爲民主方式的政體，一方面固然人人有自由發展之餘地，一方面也不至於困苦到無所告訴。他們國家的政治是上了軌道的，所以偶然有貪官發見，法律固不許他逃走，社會裏也立刻有嚴重的輿論監督着。我們的國家在「妾身未

分明」的狀態裏，所以大夥兒做貪官，也沒有什麼了不得。社會裏只可以私下談談，如果有人「正言厲色」地起來說話，就會有「私劍而窮之」禍水淋頭；或者不會到這程度，也會使你到處碰壁，教你受生活的壓迫。所以就這次接受日本投降以後的上海說，屋角道旁也聽到不少「唧唧復唧唧」謠言誹語，或真或假，叫聽的人如墮入五里霧中，莫明其妙。而堂堂皇皇地發覺出來的某人某事，終於不見。但聰明的人能殼在某種事件情態裏摸案些真相出來。

總之，貪這個字已經在吾國全面上發見了。假使「貪人敗類」這句詩真是至理名言，那末多麼危險呀！我們這個國家已被外來的鼠咬穿了吾們的「墉」，還經得起內在的鼠又齧齧齧到處咬嗎？我們不是正在大聲疾呼地要求民主政治的實現嗎？我們須防着這鼠輩利用他們的「錢可通神」的手段，學個孫行者的搖身一變，將來國民大會的代表仍是他們，正式國會的代表也是他們，政府的領袖以至小機關領袖還是他們，便是社會的領袖也還是他們！所以我主張懲辦漢奸的工作第一是肅清貪官。懲辦漢奸是加強了國民的國家觀念，肅清貪官是實現民主政治的前奏。

反對宴會政治

尊聞

據聯合日報的台灣通信上說，中國政府派到台灣去的接收人員對於台灣完全「茫然」，甚至「連溜街也是茫然的，言語不通，問路無門，有時簡直回不了住所。」然而六百萬台灣人却不原諒他們的「這種道不出來的茫然的苦衷……他們要求立刻真正解放出來，而且肅清一切日本的統治，改善自己的生活。」

這些台灣人誰然是反抗滿清的英雄鄭成功等的漢族子孫，可是毫無大國民風度。至於要「改善自己的生活」，那簡直是作夢，他們還不知道以後必然要來的第一步是物價飛騰。而且，我們長官們到台灣纔十多天，接收工作還未開始，正在「一籌莫展」或未展，而台北市慶祝光復大會游行中竟自叫出「反對宴會政治」的口號。

這真是聞所未聞的新名詞，恐怕任何辭典上也查考不出來吧，爲什麼會有這個口號呢？難道到台灣去的全是宴會專家？除了宴會而外一無所長，一事不辦？勝利宴開得太多了？報紙上每天都載着歡迎歡送歡宴的長篇紀事和照像？

這些問題都是難於解答的。不過那些宴會決不是我們的長官們自己掏腰包請客這一點是無疑的。「老爺當堂坐，酒肉自己來。」那通信上也說：「替日本人賣過大力氣的人現在經常在餐館中活動了

。」而且，在這「反對宴會政治」的口號之下接着就是「打倒劣紳奸商」的口號。那麼，宴會似乎是那些紳商們的「不惜工本」的政治活動。爲什麼要活動呢？活動的結果如何呢？

這些問題也是難於解答的。然而，台灣人「懸念自己的命運」，着急起來了，叫出口號來了。

「台灣現在還處在孤島狀態，帶一封信都要等待又等待拜託空軍朋友才有辦法，在孤島中看不見國內一張報紙，聞不到國內一點氣息。」

「看不見」和「聞不到」倒也好，因爲並沒有什麼好看的和好聞的。不過，我願意奉告他們一個與「反對宴會政治」有些關係的好消息：

「（大公報南京四日專電）蔣主席令收復區黨政軍人員嚴肅生活電到京後，陸總部出佈告，告誡文武官員，恪遵勿違，並限期三日撤消在京擅設之辦事處，退還佔領民房，同時組織黨政軍警憲聯合糾察組，偵騎四出，嚴密監視。夫子廟出入汽車已大減少，歌女營業頓告清淡。」

我們拭目視之可也。

論人民應該多說話

周 建 人

在袁世凱死後不久的時候，我同一個北大學生往北平去玩，住在先兄豫才住的山邑會館內補樹書屋裏。一天晚上有一個他的北平朋友來與他閒談，講起他的家裏認識一個袁世凱家裏的老媽子。她說袁世凱的老婆曾經有時叫她娘娘，說要做皇后了。過了幾天又叫她照舊時聲呼，不做皇后了。這樣反復好幾次。那老媽子說不懂究竟這是甚麼道理。

其實這道理並不難懂。在袁世凱時代，君主思想已經祇存留在一部份人的腦中；若干野心軍閥。倚勢橫行的走狗，及一部分思想落後的人中。大部分已經倒塌下來，起來代替的是共和政體的思想。袁氏本來是一個野心軍閥，當然會想做皇帝的。但是每一個人要怎樣做，或是否應該怎樣做，實在不是純粹他一個人的思想，是由許多人的義見彙集起來成功的。他的耳邊好像有人切切喳喳的在告訴他說：「你可以做皇帝，你可以做皇帝。」但在這一時代是帝制已將崩潰，起來了共和政治思潮的時代，他的耳邊自然又會聽到怒斥聲：「你不准做皇帝！」這等切切喳喳的私語聲與怒斥聲，世上既無鬼魅，也不是幻覺，而是遠遠地從各項人民的思想裏傳出來的消息。有些思想已將成過去，有些正在流行，有些還祇是開頭。從思想方面講，這是袁氏一時決定做皇帝，一時又不想做皇帝，他的老婆一時覺得可以做皇后，一時又不想做皇后的原因。

那時候中國人，吃皇帝的苦已經吃够了吃透了，除掉想倚勢橫行者外，大家憎恨皇帝，袁氏也就做不成，坐上皇位，馬上就倒下來了。

但是這以後，接着是貪污的軍閥的壓迫與橫行，人們卻沒有正確的認識與具體的方法去對付他們。有一次，有一個以研究教育與哲學出名的美國人，杜威教授，到中國來，聽說北平學生有一回與他講起中國政治情形時，問他對於貪污的軍閥，官吏，應該怎麼辦。他說祇要把他收入的款項與支出的款項極確實的調查明白，向報上登出來，使大家知道他私吞了多少公款，他以後便不敢那麼做，否則他的官職就不能保守了。

這條辦法，杜威以為很容易辦的，在中國却還不容易做。因為中上層分子，反對貪污還沒有像反對帝制的堅決。真正的人民是沒有不反對貪污的，但是力量還不够：有些人們還給他曲諒與寬容。而且袁氏皇帝雖然做不成，皇帝時代的專制與壓迫的作風却並沒有去掉。即使有人敢去調查收入與支出，能够發表出來嗎？多半不可能。他會忽然失踪，或者忽然得到一個毫不相干的罪名，坐在牢裏了。別人雖然明明知道他在被陷害，但又誰敢去揭穿？如果揭穿了，便是犯了罪。因此沒有人敢說話，有些人心裏是知道的，知道隱忍不說，就是讓黑暗勢力去抬頭，就是消極的支持黑暗勢力的伸長，但是沒有具體的辦法。

對於容留黑暗勢力一方面，早在一八七二年，優生學的創造者，英國人類學者戈爾登，曾寫過一

篇文章，叫做「牲畜與人的結群性」，後來收進在「人類才能與其發達的研究」這集子裏。他研究了南非洲的野牛群的生活情形之後，斷說人類因了結群的結果養成了一種奴隸性。雖然謝謝他，他說明所謂「甘心爲傳統威權，及習俗的奴隸」的奴隸性是由專制政治養成的，不是人類天生不變的性質（原來也並沒有這樣的性質）。他的全部思想不是都對，但有些話却很可以看看。他說：

「在人類的部落與國家中的元首，有一種異常的權力，比較動物群中首領所有的力量更強大。在一群獸類中，遇有一獸爲首領所憎嫌，爲首領的獸便攻擊它，於是兩相爭鬪，其餘的獸祇作旁觀罷了。但在人類，如有一人爲元首所惡，則他不但被首領所攻擊，而且還被那一班他的執行官吏的極大壓力所壓迫。這反叛的人便須抵擋一群有訓練的群力；有偵探立刻去報知他的舉動，有地方官差遣一小隊兵卒將他牽來審問；早經造好的牢獄可以監禁他，文官用法律的權力收沒他的一切所有，執法官吏預備拷打或殺戮他。人民所受的這種暴力，無論在粗暴的野蠻民族的酋長之下，或在半開化的東方的專制政治之下，或者在現在雖然比較修飾過而仍舊嚴刻的政府之下，在刈除人族中獨立性的發展上必定有一種很可怕的影響的。試想奧地利，那波爾，以至於拿破崙三世治下的法國，一八七〇年間，據十月十七日的日日新聞所載，依照條壘利官尋出的記載上說，從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起，法國有二六六四二人因政治犯罪被捕，其中一四一一八人已受徒刑，流刑，或監禁在獄中」。〔意思是說有思想能反抗的受罪，被淘汰，漸漸留下多數服從

的有奴隸性的人。)

中國人民多數不識字，我們却是識字的人民，比較有時間與發表意見的機會的，如果還是不說話或說話太少，讓專制勢力伸長上去：在良心上實在是犯罪的，便是犯了不盡人民說話的責任的罪。並且還要受到有奴隸性的壞名聲。

政治對於人民性格的影響的確是很大的，前幾年我買了一本美國勃魯克林專科大學哲學教授塞爾撒姆寫的，一九三八年出版的書，叫做「哲學是甚麼？」末章裏面有一段記着美國揆提先生所講的事情。揆提先生有一回往莫斯科去，在莫斯科公園裏與一個蘇聯的小姑娘談天。那小姑娘爲了要知道究竟美國是不是一個人可以佔有一個工廠，而且僱用幾十個或者幾百個工人替他作工，就問他這是不是確實的。揆提先生回答了的確如此以後，又加上一句說：美國還可以僱用幾千個工人給他做工哩，那小姑娘聽了很不平的說：「他們爲甚麼不把他捉起來的呢？」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的思想大都像那小姑娘那樣，又能發表他的意見與有力量推行他的主張時，不但袁世凱做不成皇帝，一切軍閥與官吏的橫行與貪污都作不成的。

人民的性質是政治造成的，但人民的性質也可以決定政治。所以西洋的某哲學家說：「政治決定人民的性質，人民的性質也決定政治。」

但是從那裡開頭呢？先有人民覺悟呢還是先把政治改善呢？

政治是人造的，如果沒有人去改善它，它自己那裡會改變？所以改善政治還是須要有人。歷史告訴我們過去的的人民的一點一滴的平等，自由，幸福都是爭來的，坐牢的坐牢，被流放的被流放，如戈爾登所講就是一斑，有時候還流着血，或大量的流血，現在大量的血已流過了。法西斯是反自由，反民主的「惡魔」，一切爭自由與民主的血已經在反法西斯的殘酷鬥爭之下流過，反法西斯戰爭一經勝利，人民應該立刻得到自由民主，是絲毫沒有疑問的。我們今日應當毫不吝嗇的說明這一點，反復主張我們要自由與民主。前面已經說過，每個人的思想，並不單純是他個人的思想，却是許多人的思想集成成功的。每個人的耳邊都像有許多人切切喳喳的在告訴他，勸他，或阻止他，叫他怎樣作或叫他不要怎樣做。因此在克服專制世界，轉變為民主世界的過程中，各個坦白、純正的人們都應當再來竭力說明這一點，來反對專制、獨裁、武斷等等。我們過去實在說話太少，「良心」上應該受罰。現在爲了大家的幸福，社會的進步，民主的生存，不得不與勝利後的路西法殘餘勢力力爭，同時以消除少說話的罪。

論新聞自由運動

董 秋 斯

十月二十三日，報紙上發表了一個消息，說是「紐約前鋒論壇報」的副主筆福萊斯特，偕同該報的主筆李德，由美國來上海。福萊斯特是擁有一萬五千新聞從業員的美國新聞協會的副會長，是美國新聞界的領袖人物。他來上海的任務，是推廣新聞自由運動。

去年秋天，福萊斯特受了故羅斯福總統的邀請，與另外兩個新聞記者，歷訪英、法、比、意、希臘、埃及、土耳其、蘇聯、印度、中國、與各地政界首要、報業領袖、著名作家和出版家交換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意見。

據福萊斯特說，他所代表的美國新聞協會，有三種主張：（一）反對新聞檢查；（二）政府不得利用報紙作宣傳機構；（三）採訪新聞，發表新聞，都應有絕對的自由。他希望各國報人把本國新聞不自由的情形，報告該會，以便隨時揭發。

爲什麼要有新聞自由呢？十月二十四日，「聯合日報」的社評中解釋道：「法西斯軸心的進行侵略，發動戰爭，主要的是靠了封鎖新聞，欺騙民衆，驅使盲目的民衆作爲侵略戰爭的工具。」所以，要根絕未來的戰爭，應當從老百姓不受欺騙作起。只有在新聞絕對自由時，報紙上才能有可靠的消息。否則每天報紙上散布的，大半是野心家的謠言。你什麼時候相信報紙，什麼時候便要上當，便會

被送上戰場作砲灰。

看到了這一點，羅斯福總統曾經宣佈，這次戰爭的目標是爭取四大自由，而其中之一便是言論和出版的自由。他也曾主張，把新聞自由一項，列入未來的和平協會中間。據十月十五日報上的電訊說，美國衆議院的共和黨員刻正組織一個有力的運動，主張不把救濟款項給不承認新聞自由或實施檢查的國家。美國本有以五億五千萬美元交聯合國救濟善後總署支配的法案。共和黨議員提議修正此項法案，凡不參加新聞自由運動的國家，不得接受聯合國救濟善後總署的資助。

美國政界和新聞界領袖對於新聞自由的主張，我們完全同意，也實在佩服他們的遠見。反觀我們中國呢，在這一主張上似乎也並不落後。蔣主席在九月三日講演中聲明：「決定尅期取消新聞檢查制度，使人民有言論的自由。」九月二十九日，中央常務委員會決議「新聞檢查，除軍事戒嚴區外，一律廢止。」據福萊斯特說，他今年初在重慶，蔣委員長，宋院長，孫院長，都向他保證，中美在軍事上的合作，已經擊敗了共同的敵人，在新聞自由上也要合作，以期達到真正世界民主和自由的目的。

據美國新聞處十月一日電，中國新聞檢查制度已於是日午夜廢除，外國記者列隊拍發初次未受「研竅」及不蓋戳印的電訊。自從新聞檢查取消以後，各報中央社的消息，已減至百分之七十。在未取消以前，中央社訊竟要占百分之九十的篇幅呢。可見我們中國當局不但承認了新聞自由的原則，也已在後方見諸實行。

但是，正如九月二十四日「美國新聞處特稿」所說，「思想自由及言論自由的實現，僅有允諾是不够的。言論必須伴以行動，誓言必須伴以事實。」新聞自由在中國是有軍事戒嚴區域與否的限界的。凡經軍事委員會規定為收復區，未完成復員工作者，皆看作軍事戒嚴區域。所以戰爭已經停止了快三個月，我們上海人還沒有資格享受這一項自由。報紙刊物，除了每日要受檢查之外，也有想出版而不准出版的，也有已出版而又奉命停刊的。據十月二十五日報載，中央宣傳部部長吳國楨在招待記者席上，談及政府准許收復區出版報紙時說，「關於中央日報的登記，則略有例外。該報戰前雖未嘗在上海出版，然即將成為第一家獲准登記的報紙。共黨「新華日報」或將不允其在滬發刊，至少在新出版登記條例未公布前，不允其發刊。」可見同屬收復區的刊物，政府當局的待遇也是「有例外的」。

九月三十日，「聯合日報」的社評中有幾句話道，「在戰爭期間，合理的新聞檢查，在每一個國家都是必須的。英美是言論出版最自由的國家，也在作戰期間設置檢查制度。這並不是政府怕人民批評——它們並不檢扣政治性的文字或新聞，而是防止國防機密被洩露，為敵利用，以至蒙受軍事上的重大損害。……但戰爭一旦結束。政府就立刻把這一部分原有的自由歸還給人民。所以現在英、美、法等所有民主的同盟國家，都已次第取消了新聞檢查制度。」事實表明，美國不僅在國內取消了新聞檢查制度，在國外也盡力推行新聞自由的政策。日本的三大報紙，「朝日新聞」，「讀賣新聞」，「每日新聞」，因為發表了美記者與日皇昭和的談話，和日皇晉謁麥克阿瑟時在美軍總部所攝的照片，

被日本內務省勒令停刊。於是，麥克阿瑟元帥立即下令停止日本一切檢查制度，並通知各報，重新發賣當日被抄沒之報紙。

大概是享受自由越多的人民，對於自由的要求也越強吧。麥克阿瑟元帥儘管取銷了日本的檢查制度，在美國依舊有人不滿意麥帥自己的檢查制度。麥克阿瑟的檢查制度，是由狄勒爾（A. Diller）將軍執行的。「芝加哥每日新聞」的駐太平洋訪員麥克蓋芬（William Mcgiffin）寫了一篇「麥克阿瑟在東京的檢查制度」。他說，麥克阿瑟的檢查制度是獨裁式的（Dictatorial）。他最不滿意的事實也是與日皇晉謁有關的。據說，在日皇晉謁以前，駐東京的新聞記者僅從日人方面得到一點消息。晉謁以後，發表的公告也很簡略。連這些新聞記者關於所受待遇的報告也被扣留。

據說，麥克阿瑟元帥有過這樣的命令：「不准批評——連暗示的批評也不准。」狄勒爾嚴格執行這一項命令，他回答記者們的話是：「我們是嚴厲的，我們要更加嚴厲，我們不許你們把任何籍口給國內批評麥克阿瑟的人。」或，「你們不能那樣說，那樣會使國內批評麥克阿瑟的人有所籍口。」根據這一項理由，不但一切溫和的批評得不到許可，連不關重要的記載也被加以禁止。他舉了一個例是：美國前駐日大使格魯下令，把他在日本的藝術品立即裝箱送回本國，這些藝術品本來用作美國大使館的裝飾，而美國大使館便是麥克阿瑟現在的住處。像這樣普通的消息也在被禁止之列。

據麥克蓋芬說，狄勒爾將軍作過這樣怕人的宣告：「到我們必須停止檢查的時候，我們依舊不准

你們通訊記者隨便議論麥克阿瑟。不要忘記，這裡的糧食是由軍隊控制的。」所以凡是報告這一類消息的通訊記者，都冒了停止軍糧的危險。

狄勒爾將軍是麥克阿瑟的親信之一，曾於一九四二年與聯合國最高統帥部同時退出菲列賓，自此以後，便成爲麥克阿瑟的發言人 and 連絡官。麥克阿瑟的檢查制度，爲美國新聞記者所不滿，似乎從克復菲列賓的日子便已經開始了。

關於菲列賓的情形，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可以「聯合日報」十月六日的社評爲代表，其中有這樣幾句話：「美國承認菲列賓自治和獨立的政策，是一個最好的教訓。在這次太平洋戰爭中，菲列賓人民對於反日戰爭的支持，是百分之一百的，靠了美菲軍民的合作，巴丹之戰支持了幾月之久，而菲列賓人民的遊擊戰，幾年來使日本在菲島上寢不安枕，沒有從侵佔中得到一點利益。菲列賓在明年七月，即將正式獨立，而美菲之間，仍可保持友好甚且更密切的關係。這對於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國家，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好的啓示。」

另外還有一種意見，最初發現在去年的英文「上海泰晤士報」上，據說是轉載一位美國女記者的評論。大意是，麥克阿瑟元帥克復菲列賓以後，嚴密封鎖新聞，關於菲列賓的近況，美國人民可謂一無所知。據從菲島回美的人說，有許多與美國軍隊並肩作戰的菲島遊擊隊員，因了左傾的原故被投入監獄。因爲當時的上海泰晤士報是日本人主辦的，雖然說是轉載美國方面的消息，也令人不敢輕信。

所以與這消息有關的人名地名刊物名，我都未記下來，連那張報紙也早已拋棄了。

但是最近，十月三十日「時代日報」上發表了一篇「論菲列賓政局」的文章，其中徵引十月二十六日特魯曼總統給美國政府駐馬尼拉代表的訓令，說馬尼拉附近各省中農村不靖，在該區中遊擊軍仍舊在作戰。遊擊軍是由佃農組成的，他們在戰前也會要求平均分配他們勞動的收穫。特魯曼總統說，這些人應當得到公平的待遇。但是實際上，他們並未得到公平的待遇。據「紐約郵報」所載，麥克阿瑟一面逮捕了遊擊隊的司令，解除他手下許多部隊的武裝，罷免了羅總統所任命的閣員中的遊擊隊領袖，一面保出曾任傀儡政府不管部長的羅克塞斯，並使他成爲參議院最有勢力的議員之一及總統候選人。在菲列賓國會中，曾與日人合作的附逆分子所占席位不下三分之一。特魯曼總統的訓令中，也有「以前幫助敵人的許多人現時仍在政府佔要職」的話。因此「紐約郵報」說，菲列賓人開始把附逆分子及所代表的剝削勢力，與美國人的出現非島，相提並論了。

關於同一菲列賓，竟有這樣矛盾的報告上，一面推爲殖民地國家的模範。一面指爲附逆分子猖獗的國土。我們當然沒有資格也不想加以判斷，我們只想以此爲例，表明新聞自由是何等的重要，又是何等的難得！現時讓我複述福萊斯特的話，爲本文作結：新聞自由運動是一種慢性革命，需要長時間的奮鬥。

民主淺說

(一)

曹伯韓

一 民主是什麼

有人以爲民主是和君主對立的，一個國家只要沒有了皇帝或國王，就可以算做民主國。這是不對的。英國現在還有國王，但是我們不能說英國不是民主國。希特勒當權時的德國並沒有皇帝，但不民主，而恰恰是民主的敵人。

有人以爲一切共和國都是民主國。這也不見得很對。意大利獨裁魔王墨索里尼倒台以後，跑到意國北部組織什麼法西斯共和國，這不是恰恰和民主相反的嗎？南美洲有些國家，名義上是共和國，實際上是獨裁國，和法西斯一樣，阿根廷就是顯著的例子。

有人以爲名義上實行憲政的國家就是民主國。這也有問題。日本是軍閥法西斯獨裁的國家，但在形式上是實行憲政的，有憲法，有議會。

那麼，民主到底是什麼呢？

民主這個名詞，在英語叫做「德莫克拉西」，也有人譯做民治。簡單的說，民主就是人民作主的政治。

國父在「民權主義第五講」裏面說過，「今日我們主張民權，是要把政權放在人民掌握之中……」

……凡事都是應該由人民作主的，所以現在的政治又可叫做民主政治。」由此可見，民主就是人民作主，而民主政治也就是國父所主張的民權主義的內容。

從前美國總統林肯解釋民主，說它包含民有、民治、民享三個意義。國父引用他的話解釋三民主義，說「我們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民生主義第二講）照這樣看起來，民主就和整個三民主義的意思相當了。

本來廣義的民主是不僅指着政治方面，而且要包含經濟民主及民族關係的民主的。經濟上的民主就是生產以養民爲目的，也就是民生主義。民族關係上的民主，就是民族平等，這是革命的民族主義的內容。我們現在講民主，必須講這個廣義的民主，這個三民主義的民主。

二 民主運動發展的過程

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是逐漸發展的。民主運動起源於歐美，已經有兩三百年的歷史。當初民主運動是資產階級自求解放的運動。那時候，歐洲各國都在封建貴族教會大地主的統治之下，多數人民沒有參加政治的權利，只是盲目的納稅、當兵，替少數統治者作牛馬，任他們剝削，任他們壓迫。隨着工商業的發達，而工商業的資產階級形成，他們的勢力膨脹，便要求過問政治。他們在政治的民主思想蓬勃開展之中，舉起「自由」「平等」「博愛」的大旗，號召一般小市民和工農，起來反對封建的

特權階級，摧毀君主專制的國家機構，廢除貴族和教會對農民的剝削制度，消滅教會對文化和思想的箝制政策。等到封建勢力被打倒，資產階級所領導的民主政權建立起來以後，民主運動便在政治方面得到了相當的成效。

資本主義經濟的發達，加深了貧富對立的鴻溝，使得經濟不民主的毛病大為暴露，而社會主義（主張把私人產業收歸公有）的思想因此發生。勞苦階層的人民，因為經濟地位太低微，沒有力量操縱選舉，沒有時間參加政治活動，縱然法律給以參與政治的平等機會，實際上還是不能參與。這樣，經濟不民主又牽累了政治民主，使它成爲不徹底的民主。所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裏說：「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爲資本階級所專有，適成爲壓迫平民之工具。」法國在十九世紀中期因經濟不民主及政治民主的不够而產生了巴黎公社的革命運動，這就是平民要求實行社會主義的開端。這個運動馬上被資產階級用武力消滅了。可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第四年，同樣的革命終於在俄國爆發，並且得到勝利。經濟的民主因此成爲世人不得不注意的問題。

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帝國主義階段，經濟先進國與經濟落後國的關係特別密切，同時彼此的利害衝突也特別深刻。換句話說，資本主義的民族國家（資本家用民族主義的口號建立起來的國家。其原來的意義，是對內的統一市場，後來變爲對外侵略的工具），對經濟落後的民族施行壓迫和榨取血汗的政策，使後者成爲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這樣國際上又產生了民族間的不平等。同時，有些民族的國

家。國內統治權操在大民族手裡，小民族也受壓迫。因此，近二十年來，東方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國家發生反帝國主義鬥爭。東歐各國則常常有少數民族的糾紛。這都是要求民族解放的民主運動。

國父看到世界上有三大不平等，民族不平等，政治不平等，經濟不平等，於是創立了打不平的三民主義，又爲了具體應用在半殖民地的中國，對經濟民主的實施辦法，採取階級協調和平轉變的道路。這就是我們現在民主運動的指南針。

從時間上看，十八九世紀民主運動的主潮是單單爲了資產階級謀利益的，領導權是完全操在資產階級手裡的。二十世紀民主運動的主潮是把民主運動推進一步，爲一般平民謀解放，也爲落後民族求自由的，領導權也從資產階級轉變到一般平民的先覺份子手裡。一般平民的參加民主運動，由不自覺轉變到自覺，這就是使舊的民主轉變到新的民主的重要因素。國父所提倡的民主，不是舊的，而是新的，他在國民黨一次全代表宣言裡說：「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爲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有也。」

三 民族問題上的民主

如前所說，現在世界上有兩方面的民族問題。就國際上看，帝國主義侵略殖民地就是強的民族壓迫弱的民族，弱的民族自求解放，所以有殖民地民族問題。這是最重要的方面。就各國國內看，假使一個國家包含幾個民族，其中人數最多勢力最大的壓迫人數較少的（少數民族）政在治經濟文

化各方面，處處給以不平等的待遇，例如納粹德國虐待猶太人波蘭人，這次大戰前的波蘭不給白俄羅斯人烏克蘭人以平等權利。南斯拉夫不給克羅西亞人以平等權利，這類的情形便引起各國少數民族的反抗情緒，於是就有所謂少數民族問題。這個問題在全世界範圍內是次要的，但在東歐各國，却有它的重要性。

現代民主主義者對於民族問題的主張，有兩個重要口號，就是「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決」。上次大戰結束時，美國大總統威爾遜曾經提出這些口號，希望列強接受，沒有人理採他，俄國革命時，俄共黨也提出這樣的口號，希望全俄各邊疆小民族，脫離專制皇帝的控制，自動的加入革命，結果所有邊疆民族都起來反抗大俄羅斯的壓迫，並且大多數參加革命，先後加入蘇維埃聯邦。另一方面，俄國革命政府依照平等原則，改變舊俄對東方各弱國的外交政策，廢除不平等條約。這又促起了土耳其中國等地的民族解放運動。

蘇聯國內的民族，非常複雜，其所以能夠團結一致的原因，就是因為蘇聯始終堅持「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決」的民主原則。蘇聯的最高蘇維埃會議是全國最高的政權機關，它包含着職權平等的兩院，即聯盟院和民族院。爲什麼在聯盟院之外還要設立民族院呢？因爲聯盟院的代表是由區域選舉產生的，區域選舉是按照人數多少來分配名額的，假使僅只有一個聯盟院，便會在會議中造成大俄羅斯族的絕對優勢。另設民族院，由各個加盟共和國選舉名額相等的代表，各民族的發言權與表決權，便

不會有大小輕重之分。這是根據民族平等原則的制度。蘇聯憲法又規定「各加盟共和國保留自由退出蘇聯之權」，這就是民族自決原則的具體化。近來蘇聯把各民族自決權更加擴大，讓它們自練軍隊，自辦外交，但蘇聯決不會因此而分裂，反而會因此更加強國力。因為各民族在社會主義共同目標之下，可以多多發展自己的特長，可以活潑的應付各自的特殊環境。政治如此，經濟建設文化教育的設施，更不待說，是依照民族平等原則，並且讓各民族五花八門的形式自由發展。例如語言文字，許多落後民族原來沒有文字的，蘇聯的領導分子根據他們的語言，替他們創造文字，因而出版了各種新文字的新書，使他們的文化水準迅速提高了。

蘇聯對於民族政策所樹立的良好模範，恰正符合了，國父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他在國民黨一次全大會宣言裡說，民族主義有兩個方面，一個是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一個是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第一方面的目的：「在使中國民族得自由獨立於世界」。我們目前的抗日戰爭，就是爲了這個目的。如果推廣應用這一原則，我國還應當在國際上主張一切殖民地的解放，這都是容易明白的道理，不必多說。再說第二方面。這個宣言又「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自決權」，主張由各民族「組織自由統一的中華民國」。「建國大綱」第四條也說「對於國內之弱小民族，政府當扶植之，使之能自決自治。」中山先生對於少數民族的自由意志，是尊重的，所以提出「自由統一」的主張。因此我們不可誤會國內各民族的自決自治等於通普的地方自治。那末，這種高度的自決自治權給予各少數民族，是

不是會促成國內各族民的分裂呢？不會！不但不會分裂，而且只有這樣，才能使各民族永久的，鞏固的結合着，才能使漢族和其他各民族團結成一個中華國族。

在滿清時代，中國就是一座民族的牢獄。屬於滿族的八旗分子，既霸佔漢族農民的田地，政府任用人員又偏重滿族，而漢族農民還要擔負游惰旗人的供養。邊疆民族如蒙古人西藏人，被滿清武力征服以後，因為清政府特別提高他們宗教的地位，支持喇嘛的統治，民族的活力漸漸由麻醉而萎縮。回族苗裔夷族的同胞，既受滿清官吏的剝削，又受漢族地主的欺凌，屢次被激起暴動，結果仍然遭滿漢族的殘酷屠殺。民國成立以後。北洋軍閥政府還是繼續滿清的民族壓迫政策，所不同的只是取消了滿族的特殊地位而代以漢族罷了。現在還有許多人以為蒙古西藏這些地方，不過是中國外圍的附屬品，沒有加以重視的必要。也有認為對付邊疆民族的辦法，只須「改土歸流」（把他們本地人的統治取消，改派流動的官吏去統治他們），使他們同化於漢族，這些漢族本位思想，不是為邊疆同胞解除痛苦，決不能解決少數民族問題。如果僅僅籠絡邊疆同胞中的上層份子如活佛喇嘛等。而不注意一般民衆生活的改善，也不是正確的辦法。日寇侵略戰發動以來，不斷的拿着欺騙的宣傳挑撥我國各民族的分離，內蒙的一部分已經被它利用，回族同胞也成為敵人誘惑的對象。我們如果趕快確定少數民族的政策，我們的邊疆同胞便不會受敵人誘惑。如果要有一個正確的民族政策，那只有遵行，國父遺教，即上面所述的合乎民主精神的「民族平等」與「民族自決」的原則。

四 政治民主第一步確定人民的自由權

民族政策是政治的一個特殊方面，現在再說一般政治上的民主。政治民主是民主運動的重心和起點，我們應當特別注意它。

政治是衆人的事，衆人的事應當歸衆人管理，才辦得好而公平。可是在君主專制和法西斯獨裁的國家，衆人的事都歸極少數人管，人民只對國家盡納稅當兵等義務，而不能享有任何的權利。結果弄得大多數人的安全和幸福都被知奪。所以大多數民衆爲了本身利益，起來反對獨裁專制，要求人民權利的確定。

人民應享有的權利，包括基本的自由權和參政權等等。人民的基本自由權，最重要的是身體，居住，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權。參政權是選舉，被選舉，複決法律，創制法律，及直接罷免議員或官吏等權利。

所謂身體自由，就是人民如果沒有觸犯刑法，經法院發出拘票的話，就不受任何人或任何機關的拘捕。居住自由，就是不受非法搜查。信仰自由，大半是指信仰宗教的自由，這就是，國家不能夠強制人民信仰某一種宗教，也不能強制人民不信宗教。蘇聯憲法上還規定了一點，人民有些反對宗教的，也可以自由宣傳反宗教的理論，不受任何人干涉，除宗教外，在英美諸國，政治信仰也是自由的。言論自由就是發表思想的自由，包括口頭的和書面的，如講演，教學著作，通信，請願等，這些

事情都不受限制。出版自由就是新聞雜誌及一般著作的刊行，不受檢查。集會自由，是指人民集合於一個地點開會，只要不是武裝暴動，政府就不能干涉，事前也無須報告政府。結社自由，是人民組織團體，如職業團體，學術團體，政黨……等不受限制，也用不着向政府立案。

基本自由權可說是參政權的基礎，因為人民若是沒有身體自由和言論自由，便等於囚犯或奴隸，根本談不上參加政治。我國有些人反對這種自由權，他們最愛引用，國父所說的「個人不可太過自由，國家要得完全自由，」及「在政治團體中不能有平等自由」的話來做根據。其實，國父的意思是警告同胞同志們莫把「自由」錯解做「放蕩」，隨便亂來，不負責任，特別是在政治團體中，少數人不可以自由行動，違反多數人的決議。爲的是，假使少數人不服從多數人的公意，集體行動便會不可能實現。可是這並不是說，個人在團體當中不應當自由發表自己的意見。相反的，在「民權初步」中，國父特別指示我們以集會結社的方法，教我們學習提議，討論，爭辯和表決的程序。一個議案在未會表決以前，是應當容許任何不同意見的自由提出的，既經多數表決以後，少數便應服從多數，照決議去做，這樣才能够集中力量，統一行動。但在行動過程中，也還得容許自我檢討和批評。雖然批評意見的接納與否，仍然須由大家公決，但各個分子是應當保留提出批評之自由權的。總而言之，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等的自由權，是民主政治的真正基礎。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所以國父在國民黨一次全代大會宣言中，以「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權」爲政綱之

民主國家最進步的憲法，不但規定人民有些基本自由權，而且不許政府或議會制定限制這些自由的單行法規（如美國），只許法律保障這些自由權（如蘇聯）。即使承認在戒嚴的宣佈仍然特別審慎，規定須經國會通過，而且時間不能過長，地域不能過廣。這都是預防政府對民權的蹂躪。

從前西方學者認為身體自由言論自由等權利是天賦的人權，每個人生出來就享有這些權利，所以不能容許國家的干涉。近來有不少的人反對天賦人的學說。國民黨一大宣言裡也指出，革命民權和天賦人權不同，對於少數妨害民衆利益之反革命分子，不能因為他們也是人而給予同樣的自由權利，把人權認為是天賦的，的確是錯誤的見解，因為人權是社會給予的。可是人類中間除開希特勒之類的少數殘暴分子不應有人權外，一般人都是應該享有人權的。換句話說，每個人應該有他的生存權和自由權。並且受社會的保障，不容許殘暴分子假借國家權力來蹂躪。

五 民主的選舉制度

參政權中最普通的一個就是選舉權。
選舉制度有種種的差別。

第一、我們要指出普通選舉和限制選舉的不同，普通選舉制，是一切成年公民，不分種族，性別，信仰，教育程度，住居年數，社會出身，財產狀況及過去活動的界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只有患精神病者及法院判決剝奪選舉權者除外。限制選舉，最常見的是以財產爲限制的標準，比方法國

波滂王朝在一八一四年公布的憲法，規定凡年齡在三十歲以上，每年繳納直接稅超過三百佛郎者才有選舉權，四十歲以上年納直接稅超過一千佛郎者才有被選舉權。這種選舉制度表明了大資本家和貴族的專政。國民黨一次全代宣言中政綱乙項第四條說：「實行普通選舉制，廢除以資產為標準之階級選舉。」這就是反對資本階級所專有的民權，而採取全體平民所共有的民權制度。不過澈底的普選制度，是連教育程度的限制也不應該有的。我國有許多農民還是文盲，即令略識文字，也不能書寫，因此在辦理選舉時，必須替他們想出一些便利的投票方式，如在候選人名單上加圈之類。若是乾脆的剝奪他們不能寫字者的選舉權，那就不符合民主的精神，算不得真正普選制。

第二、民主的選舉應該採平等制，每個選舉人投一票，不論他是屬什麼地位的人。

第三、選舉有記名和無記名的分別，又可以說是公開和秘密的分別。前一種在選舉票上，除了寫着被選舉人姓名以外，還得寫上選舉人（即投票人）的姓名。後一種只寫被選舉人，不寫選舉人。如果採用記名式，投票人便不能夠完全照自己的意思投票，因為某一候選人可以用威脅或利誘的方法運動他投票，選舉人因為面子關係，或者怕勢力的緣故，不得不依從。秘密投票，可以免除這種毛病，是更民主一些。

第四、選舉有直接和間接的分別。間接選舉是由人民首先選舉一批初選代表出來，再由這些初選代表投票選舉，這個第二次的選舉，叫做複選。我民國初年選舉國會議員和總統，都是間接選舉，

這種選舉，人民事前不知道候選人是誰，也無權選擇，一切都聽任初選當選人去包辦。直接選舉就是一次選定，但形式上有時候也像是間接的，如美國選舉總統，事先由各政黨選定候選人，人民投票只能選擇政黨。可是這種選擇仍然是為擁護一定的候選人而決定，所以等於直接選舉某一候選人為總統。總之，直接選舉要比間接選舉來得更民主一點。

第五、選舉有區域選舉和職業團體選舉的兩種。這兩種制度是可以兼採的，不過我國選舉，還是應當以區域選舉為主，因為我國的職業團體組織不健全，有職業的人也未必個個加入了團體。

第六、候選人除政黨可以提出外，一般民衆團體應該都有提出之權，但由少數職員提出的名單，應當徵求會衆同意，才符合民主精神，至於政府機關，無論是上層或基層的（如鄉鎮長），都不應有提候選人的權利，否則違反民主原則。

第七、候選人競選運動，應該採用口頭或文字的公開宣傳，發表自己的政見，來爭取民衆的擁護。如果用金錢收買，請客，或用武力威脅，或用其他舞弊方法來運動選票，都是違反民主的政治道德。

第八、選舉制中參用由政府指派或圈定的辦法，那當然是不符合民主原則的。

第九、「公民宣誓後才有選舉權」的制度，英美蘇各國都沒有，中山先生在「孫文學說」裡面雖然提到過宣誓，實際上只在組黨時偶然用過，他在「民權主義」講演，「建國大綱」及「第一次全大

宣言」裡都沒有提到這個辦法。因為這個辦法有干涉人民信仰自由的嫌疑，不大符合民主的原理，而且以我國文盲的衆多，恐怕認得並唸得出誓詞的很少，若是爲了這個形式而剝奪他們的選舉權，那就違背了普選精神。

以上已經把選舉制度說明了一下，再講講選舉權的運用。

第一、最民主的國家，不僅各級民意機關由人民選舉，而且各級負責官員也由民選。我國國民黨政綱也承認各省人民得自舉省長，至於縣以下的自治機關，更不待說。

第二、議員官吏任期不宜過久，應當時常改選，以便新陳代謝，增加國家機構的活力，適應時勢的變化；消極方面可以防止腐化與專權。

第三、被選舉出來的代表，應該對原選區選民全體負責，接納他們的意見和批評，不稱職時，得由他們罷免。

